

重庆陶研文史 (季刊)

主 管：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主 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顾 问：宋乃庆 贾培基 杜积西
 邝忠炽 李一林 孙丹年
 邹尚智 孙朝云 罗春秀
 主 编：张和松
 副主编：郭 华
 编辑部主任：代建佗
 编 委：张和松 郭 华 魏 蓉
 杨 明 蔡春洪 王天海
 夏 颖 刘 刚 刘淑兰
 贺薛毅 唐智松 于 波
 代建佗 侯晓之
 编 辑：贾振婷

准印证：渝内字(01)-(062)号
 电 话：023-68519132
 传 真：023-68852884
 邮 箱：cqyctyh@163.com
 邮 编：400050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地 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
 92号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设计编排：重庆巨典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收录网站：维普资讯网
 www.cqvip.com

行知思想

怎样做大众的教师·····陶行知 (1)
 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陶行知 (3)
 大众教育与小学教师的任务·····陶行知 (4)
 大众歌曲与大众唱歌团·····陶行知 (5)
 新大学——大众的大学·····陶行知 (9)

学陶师陶

理想校长的八个画像·····朱永新 (10)
 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与提升策略
 ······宋乃庆 吴乐乐 (14)
 向陶行知学习，做陶氏教育人·····刘裕权 (21)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与我国师范教育现代化
 ······张炳生 (23)

流金岁月

如诗如歌的育才学校专业组（连载之七）
 ······孙朝云 (30)
 中共引领的重庆救国会活动始末·····胡平原 (37)
 戴伯韬：给周恩来写信呼吁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吴海涛 (44)
 人才济济！陶行知朋友圈里的“汇文书院”校友
 ······张 铭 (48)
 许士骐与陶行知先生·····许唯物 (54)

教育教学

- 让儿童的双手和大脑共同劳动——陶行知劳动教育观点的时代意义……………黄传慧（56）
- 新时代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探索与实践……………杨玉砚（59）
- 以系统性评价改革构建良好区域教育生态……………陈如平（62）
-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覃延鑫（64）

育才风采

- 新学期：行知合一 砥砺前行 乘风破浪 逐梦追光
——在重庆市育才中学校2022—2023年（上）开学第一课的讲话……………张和松（68）
- 开学第一课 | 追光逐梦有你我，行知路上展青春……………重庆市育才中学校（70）
- 贺中秋，迎国庆 | 最美的相“育”，“才”是最好的开始……………重庆市育才中学校（75）

怎样做大众的教师

文/陶行知

我们做大众教师的人应当怎样做才能帮助解决国难而不至加重国难？我常以这个问题问人，现在人也常以这个问题问我了。这里是我的答复：

第一、追求真理

大众是长进得很快，教师必须不断的长进，才能教大众。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大众快赶上你了！你快要落伍了！“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所提出来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也只有免掉这种恐怖才能教大众，否则便要因为怕大众而摧残大众了。我得声明，真理离开行动好比是交际花手上的金刚钻戒指。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行动的真理，真理的行动（Truth in Action）。这种真理不是坐在沙发上衔着雪茄烟所能喷得出来的。行动的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行动中才能追求得到。你不钻进老虎洞，怎能捉得小老虎。

第二、讲真理

让真理赤裸裸的出来和大众见面。不要给它穿上天使的衣服。也不要给它戴上魔鬼的假面具。你不可以为着饭碗、为着美人、为着生命，而把“真理”监禁起来或者把它枪毙掉。教师只能说真话。说假话便是骗子，怎么能做教师呢？

第三、驳假话

说假话的人太多了，教师要有勇气站起来驳假话。真理是太阳，歪曲的理论是黑云。教师要吹一口气把这些黑云吹掉，那真理的太阳就自然而然的给人看见了。

第四、跟学生学

你要教你的学生教你怎样去教他。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末，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他要吃白米饭，你倒老是弄些面条给他吃，事情是会两不讨好。不但为着学生而且为着你自己，你也得跟你的学生学。你只须承认小孩有教你的能力，你不久就会发现小孩能教你的事情多着咧。只须你甘心情愿跟你的学生做学生，他们便能把你的“思想的青春”留住；他们能为你保险，使你永远不落伍。

第五、教你的学生做先生

你跟学生学，是教学生做你的先生。如果停止在这里，结果怕要弄到师生合做守知奴，于大众毫无关系。你必得进一步教你的学生去教别人。你必须教你的学生把真理公开给大众。你得教你的学生拿着真理的火把指点大众前进。

第六、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

教学不和学生站在一条战线上便不成为教师。这是怎样说呢？因为他要到西方去，你却教

他往东走；反过来，他要到东方去，你却教他往西走，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教育怎能行得通呢？有些教师不惜使用强迫手段要学生朝着教师指定的路线走，结果是造成师生对垒，变成势不两立。在势不两立的局面下还能叫学生接受他的指导吗？不但如此，先生学生虽是打成一片，如果他们联合行动的目标与大众所希望的不符，还只是小众的勾结，将为时代所不容。因此做教师的人必须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为真理作战，才算是前进的教育。现在中国第一件大事是保障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与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之自由平等。教师和学生大众都要针对着这个大目标，才能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教师和学生大众站在这一条战线上来奋斗，才算是实行

着真正解决国难的教育。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我们如果能把上面这六点做到，便不愧为现代的教师了。这样的教师，我相信，对于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是有贡献了。

原载1936年4月1日《生活教育》第3卷第3期，题为《儿童节对全国教师谈话》。文章开头还有一句：“儿童的教师应该怎样干？我拿这个问题问过自己，问过朋友，问过好多小学教师。”文中“第一、追求真理”和“第二、讲真话”中的“小孩”二字，在收入《陶行知全集》时均改为“大众”。文中开头还有一句“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

文/陶行知

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但是教育这个东西，能帮助解决国难也能加重国难，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干的。要怎样才算是一个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让我把它的特质指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它和别的教育方案是不同了。

一、它是单一的

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一切教育设施都要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做中心。教育部新近宣布国难时期教育宗旨，说：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还有人甚至于说：我们先要救教育之生命，才能救民族之生命。前一说是把生命的源头弄颠倒了。后一说是把一个生命分成两个：一是教育的生命，二是民族的生命。我要郑重的说：教育没有独立的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要教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的得救了。

二、它是大众的

民族之命非“小众”所能救。国难教育的任务，在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之第一件大事。《大公报》二月七日的社评乃把它降到第二义，可算是颠倒是非了。北平学联会所通过之非常时期教育草案是很好的，

但是《大公报》披露该案的时候，任意的把民众教育三条删掉，也是因为《大公报》是采取了一种要不得的流行的态度：不许大众救国。我们应该知道，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乃是亡国的教育，而不是救国的教育。

三、它是联系的

解决国难的教育方案，应该注重三种联系。一是内容的联系。一切科目活动都以解决国难为中心而取得联系。二是组织的联系。各界各团体都以救亡工作为中心而取得联系。三是历史的联系。把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历史的教训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样整个的中华民国是成了我们的伟大的大学校。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拟之战时教育工作计划，很详细具体，但是单以学校为组织之中心是不够的。至于有些人想把国难教育像只小鸟儿关在课堂的小笼里，那更是自欺欺人了。

四、它是对流的

比如烧水，冷水重而往下沉，热水轻而往上浮，这叫作对流。经过一些时候的对流，水就自然的沸起来了。解决国难教育的方案是必须容许上层下层的对流。领导的人总想由上而下。但是纯粹由上而下的教育，只能造成被动的群众。被动的群众是发挥不出力量来担负救亡的责任。我们必须愿意被群众领导才能领导群众。故群众对于教育必须有由下而上的自动的机会，才能把自己和领导者造成救亡的战士，而完成救亡的使

大众教育与小学教师的任务

文/陶行知

大众教育不是小众教育。就教育本身说，他是大众所有的教育，是大众所办的教育，也就是为大众解除痛苦、力谋大众利益的教育。

至于怎样办大众教育？（一）要承认社会即学校；（二）即知即传，互教共学；（三）要以新文字做教育工具；（四）抗日救国实际行动等。

小学教师任务问题：（一）追求真理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真确的认识；（二）要说真话；（三）要驳假话；（四）要虚心地跟着小孩

子去干，然后才知道小孩子的需要，知道他的需要，然后可以指导他；（五）教学生做小先生，即知即传，不要做守知奴；（六）和学生及大众都站在一条战线上。

本篇系1936年5月17日应邀宁县政府邀请在维新镇中心校礼堂，对全市小学教职员的演讲要点。报告会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主持。

原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5月18日第八版。

命。我们应当打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中间的隔板，使他们可以对流而互相教育。若把教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培养领导者，另一部分专门培养被领导者，结果必定是教领导的人脱离群众的要求，致使国难教育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东西。

五、它是行动的

高谈阔论不能救国。只有实际的救国的行动才能把将亡的国救回来，但不能盲目行动。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理论的行动，有组织的行动，有计

划的行动，有纪律的行动。所谓理论、组织、计划、纪律，又不是校长训育主任为行政便利弄出来的那一套，乃是民族解放运动所决定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

原载1936年3月1日《生活教育》第3卷第1期，题为《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

大众歌曲与大众唱歌团

文/陶行知

什么是大众歌曲？

大众的歌曲是大众的心灵的呼声。它是用深刻的节奏喊出大众最迫切之内心的要求。少数天才之创作必定是符合了这个条件，才为大众所欢迎而成为大众的音乐和大众的诗歌。大众的歌曲是要唱出大众的心事，从大众的心里唱出来，再唱进大众的心里去。它来，是从大众的心里来；它去，是到大众的心里去。

那少数的音乐和文学天才怎么会知道大众的心事呢？他们如果老是坐在沙发椅上享现成福，那是永久不会知道的。可是，他们也无须学孙悟空要钻进人家肚皮里才知道人家肚皮里的事。他们只须站在大众的战线上来做斗士，便能感觉大众的艰难，了解大众的需要，说大众要说的话，唱大众要唱的歌曲。一个脱离了大众生活的天才决写不出大众的歌曲来。因此，大众的歌曲可以说是大众运用天才写起来的，简直可以说，是大众共同创造起来的。

民众歌咏团之伟大

刘良模先生所创的民众歌咏团是大众音乐以最正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歌咏团现在在中国各大都会里都有了组织。最初在上海我曾经听过一次二三百人的合唱，他们是预备到高桥去唱给乡下人听。近来看《永生》又知道他们一团七百人，于六月七日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合唱给五千人听。会场中曾有警察干涉，但是听啊，“中国人连中国歌都不能唱了吗？”这个五千人

的吼声是使警察不好再说话。最近六月二十日夜，香港民众歌咏团团员四百人在青年会体育场上对三千民众合唱，把民族自救的声浪打到每一个听众的心里去。我这次也是听众之一，亲自感觉到这个运动的前途的伟大。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产生？

民众歌咏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从前为什么没有这样活动？我可以说像民众歌咏团这种组织，不是偶然可以产生的。比如一种花，它是原来有生命，但是气候未到，它是开不出花来；气候已到，它便自然而然的开出美丽的花了。音乐是大众心灵的呼声。大众欢喜唱歌，那是无可怀疑的。每一个大众的心灵里都潜伏着音乐的种子。但是在那伟大的音乐气候未到以前，他们只能唱几套小调儿过过瘾，表现不出很大的力量。这好比是一粒种子在地下吸收一些潮湿时所发出的低微的声音。现在是伟大的时代的前夜，大众是预备开口了。春天到了，你能叫桃花不开吗？夏天到了，你能叫荷花不开吗？秋天到了，你能叫菊花不开吗？冬天到了，你能叫梅花不开吗？大众的时代到了，你能叫大众的口不开吗？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中国是遇了空前的大灾难。中国大众不肯亡国做奴隶。中国大众要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生存。中国大众要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战，为生存而战。

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是战斗的音乐，最伟大的文学是战斗的诗歌。中国是在发动一个空前的

民族解放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时候，是自然而然的会跑出最伟大的战斗的音乐与战斗的诗歌。

战斗的音乐与战斗的诗歌之外，次有力而也含有普遍性的是恋爱的音乐与恋爱的诗歌。恋爱的音乐与恋爱的诗歌在古时与野蛮社会里也是大众的集体活动。在择配结婚的时候，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奏着恋爱的乐，唱着恋爱的歌，跳着恋爱的舞。但是在开化的国度里，这种集体的欢会是失掉了，恋爱变作个人的事，恋乐恋歌都变成靡靡之音而为大众集体生活所丢弃。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恋爱是性之战斗也是战斗的一种。恋歌恋乐未尝不可以和战歌战乐相通。假使把革命与恋爱打成一片，使恋爱受着革命的领导，那末武装的恋歌恋乐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品而为大众所欣赏。

其次就是工歌。工歌也是战歌的一种。它是与自然界和剥削者战斗之呼声。武装的工歌当然是有它的伟大，也当然是大众欢喜吃的家常便饭。

受着时代的伟大的感动，音乐的天才自然会创作大众高兴唱高兴听的音乐；文学的天才自然会写出大众高兴听高兴唱的歌词。从前有人写一首歌要找人做个谱很难，有人做一个谱要找人填一首词也很难，勉强配合起来，好比旧式结婚，总难中意。有时弄出绝大的笑话，开学歌配上出丧的音乐。其实，它们不但是不相配，而且是音乐不成音乐，歌词不成歌词。现在却不同了。一首前进的歌要一位前进的音乐家做个谱，他的谱就恰到好处。一个前进的谱要一位文学家填一首词，他一填就填到天衣无缝。而且唱起来，大众都兴奋。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制谱者、做歌者、唱者、听者都是遇着同一的大灾难，发生同一的大觉悟，参加同一的大战斗，是必然的唱出同一的大和声。

我所说的音乐天才和文学天才并不是超人的天才。有音乐的天才而实际上不是一个与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和大灾难拼命的斗士，他写不出感动大众的乐谱。有文学的天才而实际上不是与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和大灾难拼命的斗士，也写不出感动大众的歌词。现在能写大众的歌词的人是

比较的多，能写大众的乐谱的人还很少。聂耳先生之死是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最大的损失，几乎是等于音乐之国里失掉一个东北，东北可以收回，聂耳不能复活，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啊。中国有音乐天才的人数本来也有一些，多数到现在还是站在大众战线之外，享受个人的自由幸福。这些朋友到现在还写不出一件为大众欢迎的作品，这不是很可惜吗？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一加入大众的队伍和民族的大灾难开始拼命，就不啻是聂耳先生一个又一个的复活了。

然而聂耳先生给我们的音乐遗产已经是很可宝贵了。我们的劳苦大众自己创造的山歌也不错。还有好些前进的文学家所写给大众的词也值得感谢。这些人都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大众的战斗里，才把他们的天才发挥出来，写成大众的音乐，大众的诗歌，使大众有东西唱，兴高彩烈的唱了又要唱。

大众唱歌之前途

民众歌咏团已往的成绩是值得赞美，以后的前途是更加伟大。现在就我所想到的提出几点意见，供这运动的同志做参考，同时希望大家指教。

(一) 改个名字

名字要符合大众语。歌咏的咏字不很通俗。我提议把它改为大众唱歌团。

(二) 越多越好

从前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大众唱歌团的团员和大众是越多越好。少则要做到一千人唱，一万人学；多也不妨一万人唱，十万人学。旧世界只有小巧之美。那大量之美是一个新的观念。我希望大众唱歌能给这“大量之美”或“集体之美”一个深刻而具体的印象。

(三) 大众开口

大众到会场上来不是听，乃是学；不是学，乃是学唱。我们只有唱众，没有听众。起首虽是听众，当场变做唱众。这样才能更充分的发挥大

众的力量。一群哑巴的大众有什么精神呢？

(四) 选歌标准

大众唱歌团所选的歌是要有标准。一要意识前进；二要歌谱有精神；三要歌词不违背大众语。香港民众歌咏团所选的歌曲里就有一两首用文言歌词的，大众唱着调子而不懂得里面的意思，效用是未免要减少些。

(五) 到源头上去找

有些不懂事的人把人家的歌曲乱改或是不小心的抄错印错，所以选歌要在源头上去找材料。比如《锄头歌》的第四段是“革命的成功靠锄头，锄头锄头要奋斗。”香港的选本是根据一个改错的本子成了“肩着了锄头要奋斗”。这歌的原意是以锄头代表农人。它是招呼农人要奋斗，并不是叫农人拿着锄头去奋斗。这个选本又把最重要的一首丢掉。这首歌末尾还有一段：“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倘使这一段丢掉，《锄头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后头这一段，这如何可以把它丢掉呢？再么，香港唱的调子是改得与原来的不一样。词不可乱改，谱是多年民众精神的结晶，更不可以乱改。百代公司出了一张小先生唱的《锄头舞歌》唱片，是根据原来的山歌的调子收音的，可以做参考。我的主要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要谨慎的去找材料，不要轻易的改人家的作品。如果要改，也得先和作者商量，倘若真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是谁也愿意接受的。

(六) 追求歌词的意义

在小组练习的时候，每首歌的意思都要讨论清楚。这种讨论会自然的联系到时事的讨论，并引起人家去看前进杂志报章之兴趣。

(七) 引起识字的趣味

因为欢喜唱歌就对于歌里的文字发生趣味。我们如果抓住这种机会运用传递先生或小先生的法子教人识字读书，再使认字读书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也是很有益处的。

(八) 继续不断的办

照民众歌咏团的办法，每一工厂，每一店铺，每一家庭，每一学校或每一集团，只要有十人以上就可派人去教。这是一个顶好的办法。这种组织应当成为永久的自求长进的组织。因为新的歌曲是川流不息的出来，我们怎么可以中途而废呢？我们要继续的唱，唱到中国独立、平等、自由了才许它告一段落。

(九) 军歌要换

我们二百万军队是需要前进的歌曲。不幸得很，他们还是唱着没有多大意思而很难听的老军歌。一个个的军队都应该成为一个大众唱歌团。至少要采用大众唱歌之集体合唱方法，去唱民族解放之战歌。

(十) 大众唱歌团下乡

乡下人是欢喜唱歌。暑假、寒假、星期假，大众唱歌团团员应当下乡训练农民大众唱歌，并组织乡村大众唱歌团。乡下的教师如有会音乐的，应当即刻着手提倡乡村大众唱歌团，随时来它一个联村大合唱。

(十一) 告音乐天才

有音乐天才的朋友不要把自己的天才在靡靡之音上浪费掉。你们要站在民族的联合战线上来，替大众写乐谱。

(十二) 告文学天才

有文学天才的朋友再不要为文学而写文学，也应该加入大众的队伍里来为大众写歌词。

(十三) 别抄袭

不要梦想把欧美现成的歌谱拿来填词。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半殖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调子，这个调子在欧美的乐谱里是没有的。它是要我们大众队伍里的天才在中国的土壤气候里扶养出来。

(十四) 防止麻醉

唱歌是最能启发人的心灵也是最厉害的迷魂汤。从前的宗教家和现在的法西斯都用唱歌来麻醉人。那个德国的福井范格勒便是用音乐代替纳粹党去麻醉大众的所谓音乐家。美国大众上月听说他要到纽约来做乐队总指挥，大众都起来抵制，不听他所指挥的音乐，乐队里的队员也表示不愿接受他的指挥。一个麻醉人的音乐家是这样受大众的鄙弃，我们看了这件事，是格外明白大众音乐所应该走的路。在我们提倡用大众歌曲来唤起大众的时候，说不定有人也想用假的大众歌曲来叫大家再睡睡，睡到亡国再起来。我们要一

致留心，这种麻醉的策略，先给它打一支预防针。大众的时代快来到，小众的靡靡之音应该走开，麻醉大众的歌曲是格外应该走开。但空言是无济于事。只要真正的大众歌曲继续不断的创造起来，便如白日中天，什么微生物也要消灭了，让我们努力创造吧！

本篇的前两部分及第三部分的前半部曾在1936年6月28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4期发表，题为《从大众歌曲讲到民族歌咏团》。

新大学——大众的大学

文/陶行知

新大学是什么？新大学是大众的学府。

《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从前的“大学之道”。新的“大学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看来，它是变成了“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

什么是“大德”？“大德”是大众之德。大众之德有三：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争取解放。“明”即明白，要教大众自己明白大众之德是这样。

“新大众”是教大众自新。大众本来是可以明白“大众之德”，但为天命之说和别的迷信所麻醉，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新大学之任务是要教大众在真理的大海里洗个澡，天天洗，一世洗到老，使得自己的头脑常常是清清楚楚的，认识痛苦之来源和克服痛苦之路线。

“止”是瞄准的意思。新大学的一切课程设施都要对着大众的幸福瞄准。为大众争取幸福所必需的就拿来教人，所不需的就不拿来教人。

从前大学里所造就出来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我曾经为这种人写了一幅小照：

“滴大众的汗，吃大众的饭，大众的事不肯干。架子摆成老爷样，不算是好汉。”

第二种人是代替大众做事，但野心勃勃，想要一手包办，甚至不许大众自己动手来干。这样的人我们也是反对的：

“大众滴了汗，大众得吃饭，大众的事大众

干。若想一个人包办，不算是好汉。”

新大学所要培养的不是这种人。它要培养和大众共同做事的人才。如果它也免不了要培养领导人才的话，它是要培养愿意接受大众领导而又能领导大众的人才。说得正确些，它是要培养大众做大事。

还有一种时髦大学，好像是我所说的新大学而实在是和我所说的正相反。它们的作风，一动手就是圈它几千亩地皮，花它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院。我参观了珞珈山武汉大学之后，有人问我作何感想。我说如果我有这笔款，我用款的步骤是有一些不同。第一步，这笔款用来开办大众大学，足够培养五百万大众帮助收复东北。第二步，东北收回之后，假如还有这样多的款子，我想用来发展一些适合国民经济的工业。第三步，工业稍有发展，又积下这么多的款子，我还不能建造皇宫的学府，是必须盖些大众住宅，使无家可归的人可以进来避避风，躲躲雨。第四步，等到一切穷苦无告的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了，那时大众一定要勉强我盖几座皇宫的学府，我大概是可以马马虎虎的答应了。

那末，新大学就不要校舍吗？要是要的。没有也无妨，茅草棚虽小，足够办大学。

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草棚大学。

原载1936年6月1日《生活教育》第3卷第7期，题为《新大学》。

理想校长的八个画像

文/朱永新

一位东北地区的教委主任写过一本关于校长的报告文学，他用的书名是《圣园之魂》。“圣园”是校园，“魂”即校长的精神与思想。的确，校长应该是一校之“魂”。正是因为这个“魂”，学校才显出了生命的蓬勃生机。

中国教育正在走向新时代，而走向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呼唤着大批教育家。教育家从哪里诞生？我想，未来中国的教育家不会在书斋里诞生，不会在象牙塔里诞生，只能在教育第一线诞生，只能从无数优秀的教育实践者中诞生，首先将从无数优秀的校长中诞生！

我心目中理想的校长，其实也是我身边无数优秀校长的典型。我写下对他们的真诚敬意，也写下我对新时代必将应运而生的教育家们的热切憧憬。

画像一：奉献者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与使命，具有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校长。

任何一位校长，任期都是有限的。即使有些地方有的校长可能在任时间长一些，但是，他当的时间再长，在学校的历史上也还是很短暂的，只是学校无尽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环节”，正是这一位又一位的校长，造就了我们学校的声誉，托起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希望。

校长要实现这样的价值、完成这样的使命，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奉献精神，第二是

人文关怀。

我一直认为，对于校长这个职位，你把它作为谋生的方式来做，是一种做法；你把它作为追求的事业来做，又是一种做法。是否有事业心，这决定了校长的境界。一个人，只要把他的职业作为事业来做，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会奉献。

所以，我认为没有一种奉献精神乃至一种献身精神，就不要去做校长。就像有的教育家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爱心，你不要来做教师这一行。我觉得对一个校长的要求，应比一个教师的要求更高一层。他必须把学校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学校的发展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画像二：点灯人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一个珍惜学校的名誉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生命的校长。

我前面说过，任何一位校长都是他所在学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学校的历史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校长的努力来维系的。在日本，很多学校在会议室或者是礼堂，都悬挂着一代代校长的照片，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只要是做过某所学校校长的人，都应该在该校历史上留下痕迹。

注意，这不仅仅是宣传校长个人，而是给校长一个提醒：你将给学校的历史留下什么？同时，也让学校里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教师，都看

看校长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什么，为这个学校新添了什么华章，学校在他手里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发展。我想，校长如果看到自己和自己前任的像，他的责任感会增加很多。

天津的韦力校长在为我主编的《中国著名校长办学思想录》一书撰稿时，曾写过这样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四十一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我做校长时所做的一切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一生的经历就在校长的岗位上度过，不但无怨无悔，而且感到自豪。我的学校毕业的校友成千上万，他们大多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作出贡献，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我的理想，我的革命事业的接力棒，已经在他们手上传递，我的生命价值得到体现。我的生命价值就是教育，就是校长。人生如果有来世，我来世仍要做校长。”

画像三：追梦人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不断追求自己人生理想和办学理念，具有独特办学风格的校长。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人生理想，一个是办学理念，一个是办学风格，这三点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所谓理想，一位充满理想的校长，会调动教师的激情，会挖掘教师的潜能，会扬起教师理想的风帆。我想，身为校长，在你的任期内，你必须比前任做得更优秀、更卓越；你必须给后继者打下扎实的基础，你才能成为学校发展无尽长河中的优秀的一个环节。

校长的理想不仅是个人的理想，还必须把自己的理想作为教师的理想，把自己的志向作为教师的志向。在管理学里有这样个词汇叫“共同愿景”。这实际上就是把校长的理想化成了全体教师的理想，化成了全体学生的行动。这在目标管理中意义非常重大。

所谓办学理念，衡量一位校长是简单的管理者，还是教育家，根本就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有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从哪里来？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对古

今中外的教育名著、教育大师的理念的领会、学习与掌握。思想理念这个东西并不是凭空生成的。我非常强调读书，因为在中国校长中真正系统地把握教育思想脉络的人还不是很多。

所谓办学风格，我觉得就是校长富有个性的教育思想在办学上的体现。怎样形成自己的办学风格？第一是特色，第二是特色，第三还是特色。特色才是你与众不同之所在，才是你超越其他校长之所在，才是你鹤立鸡群之所在。学生没有特长，教师没有个性，学校没有特色，这是教育极大的悲哀。

对歪才、怪才不要耿耿于怀。我们应该容忍孩子们，容忍教师们，应该让学校办出特色来，办出风格来。有特色、有风格，才能有风采，才能有地位。而办出一所富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学校，才是作为校长应该赢得的人生的辉煌。

画像四：包容者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校长。

校长宽广的胸襟，首先体现在他能够接纳不同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办北京大学提了八个字：“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他把很西方、很海派的教授引入北大，也把很传统、很保守的教授留在校园，让他们各尽所长，争奇斗艳。这使北大不但成了真正优秀的大学，而且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因而孕育了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大师。

校长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不行，但只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也不行。校长不但自己应该尽可能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教育思想养料，而且也应尊重学校里不同老师的各种观点、各种想法。要尊重教师的思想个性，要鼓励教师们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唯有充满思想气息的校园，才能培养出富有思想的一代新人。

校长的宽广胸襟，还体现在能够宽容教师的教学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就是个性教育。但个性只能靠个性来培养，没有教师的个性，就绝对没有学生的个性。在学校，教师的个性往往体现为教学的个性，而教师的教学个性又

往往是他创造性能力的体现。

然而，有些校长习惯于什么都统一：教学风格、教学程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案的写法等，都要求所谓的“规范”。我认为，作为一校之长，当然在宏观上应该对学校提出一些统一的目标和指导性的意见，但宏观的蓝图要变成具体的现实，恰恰需要每一位教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画像五：“交际花”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善于协调上下左右关系，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以促进学校发展的校长。

在今天这个时代，校长的确不好当。因为他的社会角色往往很多：大多数时候是教育家，但有时候又是企业家（要考虑学校发展所必需的经费），有时候可能又是社会活动家（为了学校发展必须与社会打交道），等等。因此，优秀的校长应善于处理好各种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一，要处理好与上级主管领导的关系，争取领导的支持。任何一所学校的发展都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因此，校长要经常主动地听取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主动接受他们的指导。当然，有时校长对办学可能有一些独特的思路，这就需要校长与上级领导加强交流与沟通，以争取上级的理解与支持。

第二，要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首先是办学经费上的支持，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吸纳社会和企业的资金辅助办学，是政府所提倡的。其次是让企业家们从社会的角度，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教育发展提出一些建议，这往往能开拓我们的视野。再次，通过与企业的联系，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沟通，甚至包括拓宽学生社会实践的途径，都是很重要的。

第三，善于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要学会主动地关心社区，关心社区的发展，关心社区的命运，将学校的资源向社区开放，让学校和社区共同成长，学生和社区的居民共享教育成功的喜悦。

第四，善于处理好与其他学校的关系。在

“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之间的关系往往很紧张。其实，竞争并不妨碍合作，而是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竞争也好，合作也好，并不是只有一个赢家，也不是只有一个输家。学校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既做对手，又做朋友。

画像六：科研人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十分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并能成为学校教育科研工作出色的组织者和身体力行者的校长。

教育科研是学校的第一生产力，是学校上新台阶的重要条件。越是教育科学研究搞得好的学校，越能体现出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一所学校教育科研的成败、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支持不支持，鼓励不鼓励，组织不组织，带头不带头。

同时，教育科研是培养青年教师尤其是名教师的重要途径。因此，教育科研的投入是一位校长最有远见的投入。那么，校长应该怎样组织教育科研呢？

第一，善于组织教师读名著，学理论。教育科研的生命力来自实践，但要驾驭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功底。校长要组织教师进行教育科研，就要组织教师认真攻读教育名著。

第二，邀请名家到学校谈经验、做指导。和名家联系与对话常常能使我们得到意外的收获。大部分名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给我们许多启迪性的思想。另外，名家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联系，他们能及时告诉我们最新的教育信息，帮助我们与外界进行交流，把我们带到窗外的世界。

第三，联系高校来办基地、做实验。有的课题要我们中小学自己设计、自己操作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请高校一起来做课题。这是学校受到教育科研基本训练，提高教育科研水平的一条捷径，比自己摸索或单纯看书要强得多。

第四，积极举办学术研讨会、科研咨询会。结合自己学校的特点，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会、科

研咨询会。虽然需要一定的投入，但带来的效益往往是多方面的、长久的、难以估量的。通过这种活动，学校教育科研水平能得到提升，教师以及校长本人的能力和知名度能得到提升，学校办学的境界和品位能得到提升。

画像七：装台人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能够给教师创造一个辉煌的舞台，善于让每一位教师走向成功的校长。

校长什么时候最得意、最精神？应该是教师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时候。校长的领导艺术就体现在让每个教师的潜能得到发挥，让每个教师为你拼命工作。实际上，每位教师都有相当的潜能，这个潜能能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取决于校长对每一位教师的态度，给不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

陶行知在《创造宣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校长的成功在于教师的成功。高明的校长并不怕教师抢自己的“风头”，相反，他总是鼓励每个教师去追求优秀，追求卓越，鼓励教师进行教改探索。而且，这样的校长总是尽一切努力让教师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跳得更高，做得更棒！

苏霍姆林斯基曾自豪地说，在他的帕甫雷什中学，有一批称得上“教育家”的教师。而我认为，如果一所学校产生了一大批名师，乃至产生了教育家，这样的学校绝对是第一流的学校，而这样的校长当然也绝对是第一流的校长。

学校发展的前提，就是教师有没有这样一个辉煌的舞台。校长的使命就是搭台，让每一个角色都表演到位。校长就是要把教师推到前台，让

教师做主角。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里是没有主角、配角之分的，每个人在自己的具体岗位上都是主角。

画像八：设计师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能够使学校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的校长。

优秀的校长，能够使环境成为无声的教育者，能够让学生走进校园，便受到一种真善美的潜移默化的感染。校园环境并不是教育以外的东西，它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就是教育本身。“让学校的每一堵墙壁都能说话。”这就是注重环境对人的教育作用。

学校总是和活泼可爱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校园首先应该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花园和乐园。而现在一些学校越修越豪华，但就是越来越远离自然，越来越远离孩子的心灵。在这样的学校，可能有喷水池，却没有足球场；可能有塑胶跑道，却没有学生在兴奋时可以打滚的草坪；可能有不锈钢雕塑，却没有供学生可以胡乱涂鸦的地方……

真正优美的校园环境，应该是“目中有人”的环境：崇尚自然，同时又以人为本。一切着眼于学生的发展，让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

总之，校长是学校的总设计师，校长是学校环境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校长的境界也可以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因为学校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反映校长的精神。学校的环境最能体现出该校特有的气质，最能反映出学生和教师的精神风貌，当然，也最能反映出校长的文化品位与教育追求。

原载“校长会”微信公众号。

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与提升策略

文/宋乃庆 吴乐乐

【摘要】世界范围内各国越来越重视赋权予教师，强调发展教师领导力。区县教研员作为区域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引路人，其领导力研究成为新时代教研员队伍建设的新课题。本研究基于系统论和变革型领导理论，从学术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视角，分析界定领导力、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构成要素等。区县教研员领导力包括基础层次的通识性领导力、拓展层次的专业性领导力。通识性领导力是指区县教研员为彰显其组织领导能力所必备的思想引领力、战略规划力、沟通合作力、资源统筹力、组织变革力、共同体建设力等；专业性领导力是指区县教研员引领、协同利益相关者，为持续实现共同的教研愿景而需要具备的教育决策咨询力、课程改革推进力、教学实践指导力、学业质量测评力、教师发展促进力、专题研究行动力。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提升可通过重塑区县教研员的领导文化，深化教研员领导力专题研修，加快区域教研共同体建设，健全赋权予教研的平台机制等方面来实现。

【关键词】教研员领导力；内涵；要素；通识性领导力；专业性领导力；提升策略

新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创新驱动日益增强，人才需求日益多元化，世界范围内各国更加重视教育民主及赋权予教师，以促进教师队伍发展。中国特色的教研制度被誉为“世界公认的教育财富”，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对教师队伍建设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区县教研员普遍深入教师教学实践，是区域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引路人，通常被誉为“教师的教师”，其领导力研究成为新时代教研员队伍建设的新课题。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人们对区县教研员领导力这个新概念的认识、理解都还存在一定盲区，需要界定、分析清楚其内涵、核心要素等，才能为构建区县教研员领导力测评指

标体系、研发配套测评工具、探索提升策略、健全教研质量监测体系等奠定基础。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研究不仅为区县教研机构选拔、评价教研员提供工具，也为教研员提高自我认知、制订发展规划提供支撑，还为改进教研工作实效、支撑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一、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探析

区县教研员领导力是一种特殊的领导力，既具有领导力的共性特征，又契合区县教研员的职能定位。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研究，应该包括基于学术逻辑视角分析领导力的普适性内涵特征；基于历史逻辑视角梳理区县教研员的职能发展脉络；基于实践逻辑视角探析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

（一）领导力的内涵及要素：基于学术逻辑的视角

关于领导力的研究由来已久，侧重于从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角度对领导特质、行为、情境、权变等主题进行研究。20世纪后期，国内外学者探索将领导力研究成果运用到教育领域，对教师、校长等群体在课程、教学等特定主题领域下的领导力进行研究，这为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研究提供了借鉴。

关于领导力的内涵界定绕不开其背后的领导理论基础。学术逻辑显示，领导理论的关注点逐步从先天固有因素转到后天习得因素，从领导者单向主导转到“领导者—被领导者”双向互动，从知识、技能转到风格、情境、情感、价值观，并融入环境、过程、影响、关系等因素，这为领导力的界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领导力由“leadership”翻译而来，是指善于领导团队、组织、国家等的才能、素质。第7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领导”界定为“率领并引导”，将“力”界定为“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量、能力”等。两者组合起来看，“领导力”是指“领导者率领并引导被领导者或组织朝一定方向目标前进的能力，体现在领导过程及效能等方面”。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得出，将领导力界定为“影响力”“能力”“过程”“关系”“合力”的占比最高。一是将领导力界定为影响力。“领导者通过领导过程对被领导者所施加的影响力。”二是将领导力界定为能力。领导力是把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是领导者如何激励他人做出卓越成就的能力。三是将领导力界定为过程。领导力是领导者影响追随者实现目标的过程。四是将领导力界定为关系。“领导力的本质可被看作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五是将领导力界定为合力。“领导力可以被形容为一系列行为的组合”，即由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形成的合力。

领导力的本质是能力。第一，影响力的本质是能力。“力”是指“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量、能力”等。所谓领导力，就是一个领导

者在实施领导职能的过程中影响和带动下属的能力。第二，“关系”内隐着能力。“关系”是权变理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等关注的要素，体现在特定情境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双向互动环节中。“把领导力界定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领导者在互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能力。第三，领导力强调的是“能力”不是“过程”。领导强调的是“一种过程”，涉及领导行为、领导能力等，而领导力强调的是“一种能力或能力体系”。

基于学术逻辑视角和变革型领导理论，领导力的内涵是指领导者在特定情境中引领、影响并协同追随者及利益相关者持续构建并实现个人或组织发展愿景的能力。这种界定关注领导力系统内部及与外部环境、主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并强调四个维度的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关联。一是情境因素，强调特定任务、活动等情境；二是主体因素，强调领导者的引领作用，即领导者与追随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双向协同作用；三是过程因素，强调持续、动态构建并实现个人或组织的发展目标、愿景等；四是效能因素，强调通过领导行为、领导过程、领导结果等体现出领导力及其效能。

（二）区县教研员的职能定位：基于历史逻辑的视角

“中国的教研，可以说既有身份的元素，也有研究的元素。”这里的“身份”更多体现在国家政策对教研员的角色、职能的定位设计上，“研究”更多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上。教研是对中国几千年优秀“师道”文化的传承，是对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区县教研员职能发展脉络的梳理应该基于历史逻辑的视角，从政策期待、理论研究等维度展开。

教研的核心载体是教研机构。教研机构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承担教育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的专业机构。这种隶属关系和“自上而下”的教育管理模式，决定了教研机构和教研员的发展定位、职能职责必然与教育行政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高

度一致。在2009—2022年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及重要会议文本中，共有24份文献涉及教研、教研员、教研机构等内容。通过词频分析得出，教研机构在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促进教师发展、服务教育决策、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要求教研员做到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责任感强、教育观念正确、教研能力较强、职业道德良好。教研员要在新时代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引领、推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师资队伍等全面实现现代化。不难发现，教研员的职能职责既具有动态变化性，又具有内在一致性。

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指出“行政的‘助手’地位与业务的‘指导’功能，是对中国教研体系的定位与定性”。教研员应该为深化课改和提升教学质量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加强课程实施的研究和指导；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课堂教学改革作为教研工作的核心；把考试研究作为突破口；加强农村地区教研工作。教研员应该成为专业的课程领导者、政策执行者、课程设计者、发展服务者、专业指导者、质量促进者。省级、地市级、区县级教研机构的职能职责各有侧重，“区县级教研机构更多地面向基层学校开展教研活动”。按照活动的组织形式划分，区县级教研活动主要包括：教材教法、研究课、专家讲座、课题项目研讨等；按照活动内容划分，主要包括：学科课程的整合与开发、学科教学关键问题的确定和解决、深度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中高考命题方向和命题思路、分析和使用学生评价数据等。

历史逻辑视角下，区县教研员在政策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发挥着“最后一公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支撑和保障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彰显出领导职能和领导力。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应该全面覆盖其职能职责，并突显其对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突出问题的破解。

（三）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基于实践逻辑的视角

目前在主流数据库及相关著作中，还没有关

于教研员领导力的界定与直接研究成果。从实践逻辑的视角分析得出区县教研员领导力指向特定领域、特定对象，是一种特殊的领导力，是在领导力的通识性内涵、特征基础上衍生出的新型领导力，是指教研员在特定情境中引领、影响并协同追随者及利益相关者持续构建并实现个人或组织发展愿景的能力。这里的“特定情境”主要指教研工作、活动、任务情境；“追随者及利益相关者”主要指教师、相关领域专家、学生、家长等；“发展愿景”主要指教研员的职能职责及教研工作的价值功能、发展规划等，最终指向高质量的教育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

区县教研员作为区域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引路人，通常被誉为“教师的教师”，其内涵及价值的研究应该借鉴、关联并服务教师领导力的发展。关于“教师领导力”的界定主要有四种。一是过程说。“教师领导力似乎更强调一种过程，是把教师的‘领导作用’放在引导和协调组织成员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中来认识的。”教师领导力的发生过程是教师个人或集体影响其同事、校长，通过改善教学实践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过程。二是能力说。英国普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教师联合会将教师领导力定义为教师在课堂内外实施领导的能力。倡导教师具备领导力并非要让教师成为拥有某项特殊权利的人，而是强调教师应具备统筹管理各方面的能力。三是影响力说。美国教师领导力探索联盟认为，教师是通过受到同辈人的尊重、不断学习、平易近人、利用群体技能和影响力来改善同辈人的教育实践而成为学校的领导者的。“教师领导力是教师个人或集体在学校建设过程中依托专业权威主动对他人所形成的实在影响。”四是角色职能说。马克·斯米尔（Mark A. Smylie）指出，教师领导力被定位为正式的角色和头衔所发挥的指导作用。相关界定具有四个共性特征：一是将内涵主要定位于能力，包括影响力；二是外延围绕职能职责展开；三是指向目标、愿景的实现；四是来源涉及“正式角色、头衔、权力、职位等”与“非正式、非职位、非权力”，侧重于后者，突显专业能力、内涵品质。

基于学术逻辑视角下“领导力”内涵界定的研究结论，结合历史逻辑视角下“区县教研员”职能发展脉络，从实践逻辑视角，本研究将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界定为“在推进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促进教师发展、服务教育决策等情境中，引领、影响并协同教师、学校、学生等持续建构并实现区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目标愿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的能力”。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有五点“强调”，即强调在区县教研工作情境中，强调教研员的引领、影响的作用力，强调与教师、学校、学生等追随者的双向协同，强调持续、动态构建并实现发展目标、愿景，强调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健康成长等行为效能。

二、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区县教研员领导力是由情境、主体、过程、效能等核心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基于系统论视角，从基础层次的通识性领导力、拓展层次的专业性领导力两个维度分析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构成要素，能够支撑测评指标体系研究。

（一）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维度建构

基于系统论层次性原理，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一级维度主要包括：基础性（通识性）领导力、拓展性（专业性）领导力，前者是教研员扮演领导角色、发挥领导职能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后者是教研员胜任、推动教研工作应该必备的能力，二者的内涵、价值、功能具有质的差异。

基于整体性原理，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二级维度主要包括：一是教研员发挥领导力所应具备的思想引领力、战略规划力、沟通合作力、资源统筹力、组织变革力、共同体建设力等通识性领导力；二是教研员胜任教研工作、实现教研愿景所应具备的教育决策咨询力、课程改革推进力、教学实践指导力、学业质量测评力、教师发展促进力、专题研究行动力等专业性领导力。系统整体性原理还体现在教师、学生、学校、专家、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建构、实现教研愿景等方面。

（二）区县教研员的通识性领导力分析

通识性领导力是区县教研员发挥领导职能、胜任领导角色所应具备的关键能力。其中，思想引领力是深层的、核心的、内隐的，包括吸引力、凝聚力、竞争力，能确保区域教研的正确方向和高效运行；战略规划力着眼于区域教研及其团队的未来发展；组织变革力着眼于区域教研实践过程中的探索创新；沟通合作力侧重于区域教研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分歧管控和共识达成；资源统筹力侧重于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良性协同；共同体建设力着眼于区域教研团队的持续发展以增强领导实效。

一是思想引领力。在教研实践中，区县教研员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先进的教研理念、强烈的区域教研责任意识、独特的教研风格、强大的人格魅力等，能够触动利益相关者的思想、观念、情感，激发他们更深、更高层次的动机，吸引他们持续追随并实现区域教研目标。二是战略规划力。领导者应“根据所面临的形势，运用战略思维能力，明确战略方位，确定战略方向，制定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区县教研员要具有前瞻性眼光，能够精准预见和客观研判区域教育与教研改革发展的机遇、挑战、优势、问题等，善于从整体上把握教研工作的全局和规律，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系统内外部环境中制定符合实际的中、长期教研发展规划。三是沟通合作力。区县教研系统内部包含着复杂多元的要素，要素之间客观存在着多样化的关联结构及物质、信息、能量等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区县教研员应该具备高超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合作能力，善于管控教研工作分歧，引领团队维护区域教研利益，共同实现教研目标。四是资源统筹力。区县教研员既要着眼于对教研系统内部资源进行发掘、整合，增强对系统内部要素进行统筹的力度；更要着眼于对系统外部显性的人、财、物等资源进行整合和对隐性的制度、文化、环境等开展建设性工作，实现教研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良性、可持续关联。五是组织变革力。区县教研员要根据教育、教研形势的根本性变化，主动推动教研系统的长期发展规划

进行战略调整,稳步推动教研战略转型,最终实现区域教研变革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六是共同体建设力。区县教研员与教师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构成了教研共同体,他们都是教研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领导要素。区县教研员要促使共同体成员具备共同的教研愿景、价值观念、专业精神等。区县教研员要构建共同参与区域教研的文化氛围,引领团队共同构建并实现教研愿景;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领导者角色,共谋区域教研发展;力促团队成员实现共同发展,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氛围。

(三) 区县教研员的专业性领导力分析

区县教研员专业性领导力是定位在通识性领导力基础上的拓展性领导力,是体现区县教研员价值、定位、发展期待的领导能力。专业性领导力是区县教研员胜任教研工作、推进教研工作、实现教研愿景的专业能力,是在教研员职能职责的发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与教研工作实践高度融合、内在统一。

一是教育决策咨询力。在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区县教研员服务教育决策的价值、职能越来越受重视,主要体现在教育教学改革政策的解读与细化、区域教育发展规划的设计、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专业支撑等方面。二是课程改革推进力。区县教研员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顶天立地”的衔接与转换功能,具体体现在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及课程标准、挖掘国家课程的核心育人价值和功能、做好区域课程整体规划、拓展优质课程资源研发等方面。三是教学实践指导力。“教研工作的专业特殊性在于‘教学指导’。”对教学实践的研究、指导、服务,一直是教研员最重要的职责,尤其是处于“最后一公里”的区县教研员,更应该以一线教学实践指导为“主业”,大胆探索大单元、主题式、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模式,以及研究性学习、跨学科综合性学习等策略。四是学业质量测评力。区县教研员的学业质量测评力集中体现在对阶段性作业设计、终结性学业水平测评等的研究与指导能力上。区县教研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现代的基于大数据的先进信息技术手段,整体设计并有效推进增值评价、综合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四维一体的评价改革;科学、系统开展新高考、新中考等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改革研究,实现达标性与选拔性的目标整合、全面性与选择性的定位整合、考试评价与育人的功能整合、公信力与可操作的价值整合。五是教师发展促进力。作为区域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引路人,区县教研员必须具备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基于研究的培训、基于证据的指导等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服务教育发展重大需求;加强训后跟踪指导,构建专项培训质量评价标准。”六是专题研究行动力。“教研员的核心能力是研究能力。”教研员是不同于区域基础教育教师的专业领导者,须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区县教研员的专题研究行动力应该是基于对区域教育教学实践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决的能力,综合运用类比循证、回溯循证、既定规则循证、专家意见循证、实践推理循证等方式,开展实证研究的能力。

三、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提升策略

基于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要素,从价值引领、素养提升、组织优化、条件保障等维度,重塑教研员领导文化、深化专题研修、加快共同体建设、健全平台机制,以此促进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提升。

(一) 突显价值引领:重塑区县教研员的领导文化

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得到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逐渐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个体及社会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继而外化于行。重塑区县教研员的领导文化,强化民主参与、协同共生的价值导向,对激活、发挥、提升区县教研员的领导力并改进区域教研工作实效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一是激活区县教研员的领导自觉。区县教研员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对区域教研工作规划、实践具有不可推卸的引导责任,教研员领

导力具有严密的学术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支撑。区县教研员应该明确自身的教研领导定位,激活区域教研领导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区域教研领导意愿、自觉、信心和内动力,改进区域教研领导效能,进而促进自身领导力的提升。二是营造区域教研的领导文化氛围。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区县教研员应有序推进区域教研价值观念、核心任务、方式机制的转型发展,关注个体差异、用户需求,强化民主协商、多维共生,促进教学相长、优势互补;理顺区域教研系统内部与外部相关主体、要素的价值、需求及关联,从精神环境、物质环境、制度环境等维度,构建区域教研领导的良好生态,将教研领导融入区域教研的精神生产、观念形态、思维方式及行为实践中。三是增强区域教研领导实效影响。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内涵具有目标性强、前瞻性强、发展性强、全局性强、实效性(影响力)强等特性。作为区域教研内隐和外显的领导者,区县教研员应该在通识性领导力基础上不断提升规划、推进、实现教研愿景的专业领导力,通过深化教研活动的过程、实效及影响,激活区域教研领导活力,营造区域教育领导环境,凝聚区域教研领导合力,重塑区域教研的领导文化。

(二) 加强素养提升:深化教研员领导力专题研修

变革型领导理论强调“真正的领导力是将职位影响力与非职位影响力结合统一起来,并以非职位影响力为主。只有发挥人格魅力、道德感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等作用,领导者才具有真正的领导力”。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研究聚焦内隐的非职位影响力,从通识性领导力、专业性领导力维度建构了核心要素体系,为区县教研员领导素养提升指明方向、提出要求、带来挑战。一是系统开发教研员领导力专题研修项目。区县教研员应基于系统论的整体性、层次性原理,聚焦基础层次通识性领导力、拓展层次专业性领导力的提升,系统开发领导力提升专题研修项目,全面探究“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全面覆盖理论引领、价值澄清、情境示范、自主实践等方

式,凸显螺旋式上升、区域化定制、菜单式选择等特征,实现专题与综合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显性与隐性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二是科学创新教研员领导力专题研修方式。区县教研员的领导力是在其职能职责的发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区县教研员应该聚焦职能职责,探索、创新领导力提升的研修班、工作坊、名师工作室、研修共同体等模式,注重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名师导学、跟岗体验、影子训练、课外活动渗透、自我评价反思等,做好区域协同、专家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搭建区域主题研修、跨学科研修、网络研修、结对帮扶研修等平台,增强研修实效。三是探索建立教研员领导力专题研修基地。相关部门应深入统整高等师范院校、省级教研机构、区域知名学校等教研系统内部、外部优质资源,分级建立一批教研员专业发展研修基地,加强基地育人目标、课程资源、研修方式、评价管理等方面的建设,分批选送区县教研员进入基地开展领导力提升理论学习、自我研修、实践锻炼等工作,实现制度化、全员化、优质化研修。

(三) 推进组织优化:加快区域教研共同体建设

区域教研系统是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若干主体、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是区县教研员领导力发挥、提升的核心场域,应该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系统论整体性原理优化区域教研组织结构,构建现代学习型教研共同体,促进区域教研领导效能的发挥。一是优化教研队伍结构。相关部门要基于区县教研员领导力内涵、要素,配好区域教研共同体负责人,凸显其教研领导才能;拓宽区县教研员遴选渠道,引进思想引领力、战略规划力、共同体建设力及专业性领导力强的优秀实践名师、理论学者,优化知识、能力、学历、年龄、性别等结构,处理好同质与异质之间的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二是建构教研共同愿景。愿景是一种意愿的表达,涵盖了未来目标、使命及核心价值。区县教研员应该不断提升思想引领力、战略规划力、组织变革力,善于引

领团队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继往开来，持续建构并实现区域教研领导共同愿景，打造共同价值观念，使团队形成思想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使团队形成教研共同体的内隐文化、团队魅力和行动自觉。三是践行“共享性领导”。区县教研员打造区域教研共同体中人人主动参与规划、推进区域教研的融洽、和谐、共生的合作环境，营造包容冲突、民主集中的教研氛围；增强以情感、人格魅力、专业素养等非职务因素为纽带的身份关系，通过对话、参与、互动、探究、反思、创生等，助推区域教研共同体发展。

（四）强化条件保障：健全赋权予教研的平台机制

系统论突变性原理揭示，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提出及提升需要打破传统教研惯性、融入新时代教研元素，而传统教研系统在量变未达到质变的过程中具有维持自身结构、状态的能力，需要健全并强化赋权予教研的平台机制。一是科学赋权予区县教研。区域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并尊重教研员、教研机构、教研工作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专业性，在加强组织领导的同时推进教研去行政化，以新时代新型智库建设为导向，科学赋权予教研员和教研机构，营造民主参与、专业引领、优势互补、分布式领导的管理氛围，深度统整区域教研系统内、外部平台、资

源，支持并保障区县教研员引领区域教研共同体独立开展专业实践活动。二是健全教研评价体系。相关部门要基于区县教研员领导力内涵及构成要素，建立配套评价标准，并将之纳入区县教研员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强化教研员领导力的价值引领；探索采用情境模拟法、结构化面试法、关键事件法、深度访谈法、跟岗评估法等考评方式，健全区县教研员领导力考核评价；建立区域教研领导力荣誉表彰制度，树立典范，推广经验，辐射全员。三是建立教研容错机制。区县教研员领导力的发挥必然涉及具有前瞻性、方向性、探索性、创新性、变革性的教研规划及实践活动，尤其针对中高考及阶段性学业质量测评命题、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决策等事关千家万户、社会影响巨大的高利害教研活动，相关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权力与责任、失职与违法的边界，保护区县教研员及区域教研共同体发挥大胆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宋乃庆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吴乐乐系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南大学博士生。

原载《教育科学》2023年第3期第8~14页，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西部项目“新时代中小学文化自信培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EA180292）阶段性成果。

向陶行知学习，做陶氏教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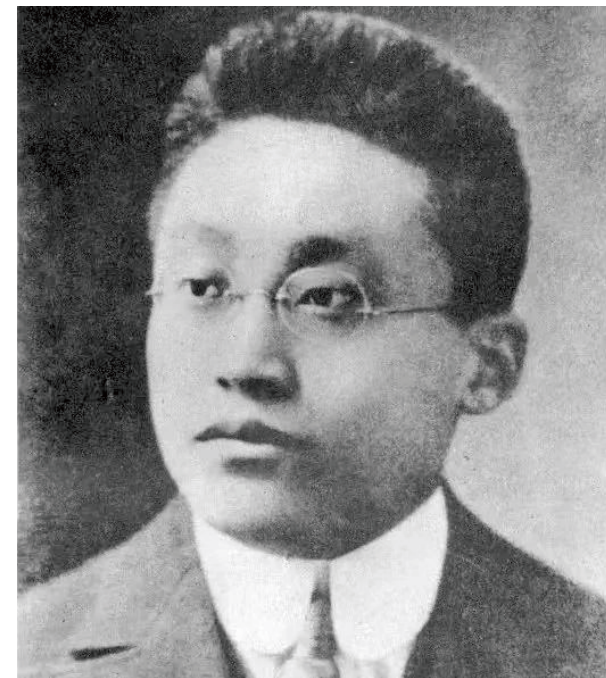
文/刘裕权

1982年大学毕业，走进人民教师行列，成为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已经整整四十年。从教四十年，心中只有庆幸而无后悔；从教四十年，“学陶师陶研陶践陶”四十年；从教四十年，“与时俱进”、不断守正创新的四十年，不断实现“向上向前发展”的四十年。从教四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向陶行知学习，做‘陶氏’教育人”。

还记得，当我大学毕业，正式走向那神圣的三尺讲台的时候，“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氏”箴言，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和耳边；“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陶氏”箴言，一直伴随着我在教育事业中的每一天、每一言、每一行。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昨天，陶行知先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一生一世奋斗不息。今天，为了

继承陶先生未竟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理想，为了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了中华民族腾飞在21世纪，我们坚持不懈地学习、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学习与践行陶行知先生做人做事的风格。



陶行知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南京晓庄师范、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育了多少中华精英；“甘为骆驼，爱满天下”，多少人中豪杰尽享陶先生的乳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腾飞奉献自己的力量、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当我和学生们、听



陶行知创作的字

众们一次次地分享“学陶师陶研陶践陶”的心得体会的时候，面对陶行知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人格，我们今天的教育人应该思考点什么？应当做点什么？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人生首先贵在追求，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追求并不在乎你得到或得不到，追求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意义。一个毕生追求的人，他不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太长或者太短，他只会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路在脚下不断地延伸，伸向很远、很美好的地方。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人生贵在奉献。“春蚕至死丝不尽，蜡炬成灰连灯台。”这是对人民教师奉献精神的赞美、是人们对教师博大胸怀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个人应当有一点牺牲精神。的确，从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名人、伟人所走过的路和丰功伟绩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真理——做人要有奉献精神。不能给予别人幸福的人，也不会从别人那里获得幸福；没有真心帮助过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别人的真心关心与帮助。因为“打动人心的是人心。”今天的教师要坚持爱自己所教的每一个学生，尤其是要厚爱后进生，因为陶先生早就告诉我们：“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要等到，坐大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是教师，自己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教给学生。“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我们要向陶先生那样努力地学习，尽量做到“每事问”——“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在学习中、在生活中、在“每事问”中，我们要坚持尽力地博览群书，广收精神食粮，不断努力实践，提高自己的聪慧水平；我们还要注意有心地培养自己的自信心——自信是大多数有所建树的人所共同具有的一种高贵品质，也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在地下。站起来吧！加倍地感到自尊，三倍地感到自

重，四倍地感到自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向陶行知学习，做“陶氏”教育人，就是要像陶行知先生一样，通过不断地修炼，让自己拥有“陶氏”般的“四颗心”，真正成为“陶氏”教育人。

“陶氏”的“四颗心”，一是“仁爱之心”，以自己对中国民族、对人民大众深沉的“爱”，转化为对教育事业的爱、对学生的爱，让“爱满天下”；二是“农民化之心”，让自己“与农人共鸣，从大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心甘情愿地“为农人活，为农人死，和农人共甘苦，同休戚”，守住教育事业、追求教育事业、奉献教育事业，就是守住自己的初心、守住学生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心；三是“新型教师之心”，让自己既要有“农夫的身手”和“科学的头脑”，还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坚持“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为了生活的向上向前而教育”，坚持“教学做合一”，以“做真人”“育真人”为终极目标，坚持不懈地“真教、真学、真做”；四是“教育家之心”，以教育为信仰，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追求，“敢探



上海行知公园雕塑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与我国师范教育现代化

文/张炳生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奠基人之一。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师范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学习和研究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师范教育体系，推进师范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陶行知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奋斗了一生。他在改革教育的实践中特别注意师范教育这个重要环节。他在筹办晓庄师范时曾经表示：“我以前曾经为师范教育努力，现在正是为师范教育努力，以后仍是继续为师范教育努力。”

陶行知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师范教育理论，从办学方向到培养目标，从教育内容到教学方法，从教材教法到培养途径，从普通师范到幼儿师范、职业师范，都作了全面论述，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入改革和逐步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思想体系。

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每一个教师只要拥有了这四颗“陶氏”教育人之心，就一定能够张开自己的双臂，勇敢地迎接命运的挑战，最终必将迎来更

（一）要“办合社会应用的师范教育”

陶行知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是基于他对整个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陶行知从教育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这一根本思想出发，明确指出作为普及教育之本的师范教育办得好与不好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事。他认为，共和国要有适当的国民，“就全靠教育”，“要造就适当的国民，须有适当的教员。”而要教员就要有师范，所以“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国家所托命之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陶行知是第一个把师范教育提高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密切相关的高度来阐明其地位和作用的教育家。

从师范教育的社会价值出发，陶行知提出师范教育的“合用”问题。他认为“办师范教育要合社会的应用”。这不单是数量上要解决“够用不够用”的问题，这就是在数量上师范学校究竟要造就多少人才方可够用；更要在性质上解决

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师范学院教授。

“合用不合用”问题。师范教育不合社会之用其主要表现在不能培养有生活力的教师，“好些师范学校在那儿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大书呆子分布到小学里，可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若再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变成书呆子。”他急切主张对旧师范教育进行根本改造。在改造旧师范、建设新师范问题上，陶行知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最根本的一条是师范教育要受生活教育理论的指导。他认为师范教育应根据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以训练有生活力的教师，通过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有生活力的新一代，使他们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他还主张运用中心学校之精神和方法去培养师资。他指出，“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生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中心学校产生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生活力的国民”，“师范教育既以中心学校为中心，就得跟着中心学校跑。”为了彻底改革中国教育，他还十分重视师范教育的改革和试验的作用。陶行知通过创办晓庄师范，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推动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师范教育改革试验，就不可能实现师范教育的自身改革和整个教育的彻底改造，就不可能实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目的。从这一点正是体现了陶行知对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

（二）“师范教育要培养一流的教育家”

培养合格的教师是师范教育的根本任务。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需要出发，对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陶行知认为，依靠好教师可以办好整个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起来。因此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兴衰的关键。他批评那些只管教书而没有革命精神和实际本领的教书匠，指出这些人“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之外，便没有别的事做。”这样的教师是不合时代要求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应该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他在生活教育运动

的各个阶段，对教师先后提出过若干不同要求。在提倡新教育时期，他对新教员提出以下希望：第一，“要有信仰心”；第二，“要有责任心”；第三，“要有共和精神，事事与学生共甘苦”，第四，“要有开辟精神”，第五，“要有试验精神”。在试验乡村教育时期，陶行知希望教师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把环境的阻力化作助力，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精神；做人民的朋友，有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难教育时期，陶行知提出做大众教师的人应当解决国难而不致加重国难，必须追求真理，讲真话，跟学生学，和学生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在民主革命时期，陶行知认为人民教师必须虚心好学、宽容，理解学生，能解放学生的眼睛、双手、头脑、嘴和时间、空间，跟民众学习，放下先生架子等。陶行知在各个阶段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尽管内容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基本精神。

陶行知认为培养各级各类教师要有共同的目标和要求外，还必须有各种具体的目标和要求。陶行知从我国85%以上人口在农村的国情出发，特别强调培养乡村教师的重要意义。搞好乡村教育关键要培养出能完成改造乡村使命的教师。这样的教师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他于1927年亲自创办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进行乡村师范教育全面改革和改进乡村生活试验。

陶行知还提出培养第一流的教育家的要求，这是师范教育高层次的培养目标，他批评常见的三种教育家：政客的教育家、书生的教育家和经验的教育家。他指出，“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的，”他号召教育工作者要做有胆有识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去开辟创造第一流的教育。所谓第一流的教育家，就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教育家，才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三）“师范教育要符合全部学制的需要”

20年代初，陶行知根据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我国师范教育的经验，提出了“广义的师范教育”思想。广义师范教育对于师范教育的办学方向、性质、任务、结构模式、培养目标、教学机制、管理体制等都赋予广泛的含义：一是确立面向大教育的师范教育办学方向。陶行知主张师范教育必须面向全部学制的要求。全部学制包括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样的教育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逐步从小教育变为大教育。大教育也就是陶行知所讲的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师范教育必须为大教育培养和训练各种各样的教育人才。二是全方位的师范教育功能。广义师范教育不仅要培养训练教员，而且要培养训练教育行政人员、各种指导员、各种学校校长和职员；不仅要培养未来师资，而且要训练在职教师；不仅要培养训练教师具有一般的学识才能，而且要分别因学校等级、市乡情况、学科性质而培养训练教师具有特定学识才能；不仅要培养教育工作人才，而且要培养教育科研人才；不仅要有学历教育，而且要有岗位培训，等等。总之，“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三是多元化的师范教育结构。陶行知设计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是立体交叉、纵横沟通，灵活多样、正规化和机动性相结合的。不仅有以培养未来教育人才为主要任务的教育研究院、高级师范、中级师范，初级师范，幼儿师范、女子师范以及大学教育科、中学师范班、中心小学师范班、大中学校的职业教员养成所等；而且有以训练在职教育人员为主要任务的长期或短期的各种师范补习学校或培训班、养成所，甚至还有即知即传的“艺友制”“小先生制”“传递先生”等。上述三大块都强调师范专业的“系统研究”“充分的修养”“继续的机会”。正规化不能追求形式，机动性不是降格以求。所以，广义师范教育的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基本国情之上能够主动适应整个教育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能主动满足各种各样教育人才提高自身素质的迫切要求。

（四）“活的师范教育”要适合“社会之需要”和“学生个人之需要”

陶行知在教育的实践中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和“教学借古讽今事”原则，为变革师范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开创的师范学校教育教学论和方法论与其教育的本质论、目的论是一致的。陶行知主张师范教育必须适合社会生活和学生的个人需要，其培养的方法必须与社会生活实践和学校教育的实践结合，实行“教学做合一”。陶行知这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展开多元生活教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主张学校要根据社会发展和育人的需要，在学校组织健康的生活教育、劳动的生活教育、科学的生活教育、艺术的生活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教育。在现代生活中还要进行现代教育。“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以中心学校生活为训练之中心”，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培养一个乡村教师所需要的改革教育、改造农村所需要的全部能力。

第二，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可通过集体生活进行，陶行知说：“全部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集体生活是全部教育的基础有三个意义：一是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是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三是集体生活用众人力量集体地创造出合理的生活。陶行知认为这种集体生活采取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集体自治，目的让学生在集体自治中学会自治；二是集体探讨，目的让学生通过集体的努力，追求真理；三是集体创造，目的是让学生运用有思考的行动来产生新价值。这种集体生活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而是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并注重个性发展。

第三，坚持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陶行知的办学原则。陶行知认为教学做合一包括三方面：一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对事说是

做，对自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无论哪方面，“做”成了学的中心，即成了教的中心，坚持教学做合一最主要的要处理好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使之整合。

陶行知主张教与学都要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学上学”，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即在劳力上劳心。这就是要把实际生活中的事拿来研究，一面动手干，一面动脑想，手脑结合，“以期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教与学以做为中心，就是说教与学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进行。这种做有三个特征，即行为、思想、新价值的产生，也就是通过学习、思考，进而创造。

教与学是教育活动中两个基本问题。陶行知认为，教学过程中，先生的责任不在教，不在教学，而是教学生学。教师不能“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而应该主动了解学生，改进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提高自己，去教好学生。

第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进行生活教育，必然需要依赖并调动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的自动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发展。陶行知认为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就要提倡自动主义，即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智育注重自学，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学，不是坐而受教。学生除跟教师学，还要跟伙伴学，跟民众学，到图书馆去学，到社会和自然界中去学。体育注重自强，就是动员学生自觉积极地“建立健康堡垒”，因为，“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所有。”德育注重自治，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自治“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适应学生之需要”“辅助风化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

二、我国师范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发展趋向

师范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我国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师范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师范教育现代化就是使师范教育适应我国教育现代化的

需要，迅速达到先进国家师范教育发展水平的运动。师范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又是师范教育高度发展的一种状态。师范教育现代化在对传统师范教育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崭新的特点，具有自身的发展趋向。

（一）师范教育结构现代化

我国师范教育一直是有独立的体系，而且这一独立教育体系在较长时期内仍然存在，这是我国的重要教育国情。但是，这一独立的教育体系在深化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以独立的师范院校为主体，包括有的综合的师范教育结构形式。定向型师范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师范性强、基本功扎实、与教育实践结合较好的优点，也有学术水平不高、视野和知识面较窄、自我发展能力不够等缺陷。因此定向型和非定向型相结合的师范教育结构，有利于优化师资队伍和提高教师的素质，也能为教师的自由流动和教师供求的市场化创造条件。比如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非师范专业毕业的学生，如果想当教师再加修相应教育类课程，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就可以从教。总之，构建多元化的开放式的教育结构，体现了师范教育现代化的趋向。

实现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转变，是师范教育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我国师范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主要在层次水平上。师范教育层次的上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取消中师教育，降低专科比重，本科和研究生层次比重上升。二是以国家或省重点建设的师范大学为龙头，整体提高师范教育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师范教育模式现代化

现代化师范教育模式的建立就是把师范教育放到现代化教育这个大背景下，以现代教育思想及培养具有现代教育意识的具有良好教育素质的教师这样的教育目标为依据，把师范教育模式划分成现代化师范教育环境、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教育课程及现代化教育技术方法四个方面。

这一模式具有开放性和整体性特点。开放性是指师范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信息网络不断扩展，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建立的今天，师范教育与社会大系统的信息交换也更为频繁、广泛。师范教育只有主动与社会大系统沟通来调整办学目标、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采用大教育观、大课程观，求得与整个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适应。整体性是指师范教育模式现代化不是指某个局部、某个因素的现代化，而是包括了教育观念和思想、物质和精神环境、管理制度与手段、课程结构与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现代化，体现了对师范教育整体和系统的把握，使师范生在知识、技能、能力、品德、体质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和谐发展。素质教育是整个教育改革的方向。师范教育要从实施素质教育角度来不断更新传统的观念，重新审视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功能等，从而建立起崭新的师范教育模式。

（三）师范教育功能和目标的现代化

师范教育作为教育的“工作母机”，培养造就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科教兴国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师范教育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技开发等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还具有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特殊功能。师范院校要为基础教育发挥全面的服务功能。一是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二是加强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和服务指导，包括中小学教材教法改革研究和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形成职前职后师范教育一体化的办学体制。三是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教育决策咨询。全面发挥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功能，是师范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要全面发挥师范教育的社会功能，必须确立现代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素质教育呼唤高素质的教师，要从培养新世纪高素质的教师角度去设计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具有广博、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又有学科专业基础知识，还能掌握现代信息技

术；要有现代化的教育观念，在认识教育的未来性、生命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教育观、学生观和教育活动观；要具有现代化的从教能力，全面掌握教育规律，熟练运用教育原则，形成职业性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教育教学能力、处理教学内容能力、观察和研究学生能力等；要具有创造性人格品质，有对教育事业的崇高使命和敬业精神，尊重和爱护学生的人道精神，有为人师表和严格自律的“师范”意识，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善于适应各种环境的健康心理素质和研究问题的创新性品质。

（四）师范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现代化

师范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教学现代化，即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现代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现代化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影响了师范教育现代化的全局。这一发展趋势预示着师范教育课程体系由专业化向教育性、综合性方向发展。首先师范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现代化要体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期教育发展指导方针，即师范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在这一基础上，横向上具有开放式的国际视野，纵向上具有面向未来的超前视角。一句话，能建立起具有时代特点的符合师范教育规律的课程体系。其次，建设好师范教育专业，处理好师范专业和普通专业关系，各专业之间尤其是文理专业之间关系、专业理论课与专业能力课之间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师范专业和普通专业的有机结合，在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的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必须符合专业的要求，努力使专业水平在教学和科研上达到现代化的学术要求。这儿所说的现代化学术要求不只是反映在各个普通的专业上，而且还反映在教育专业上，注重学生教育素质的培养，以保证完成师范教育专业的特殊培养目标。二是体现为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要求，特别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和培养，以丰富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学生的教育智慧、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三是专业理论课和专业技能课具有合理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育人能力。学生的育人能

力在将来不只是一种属于“自我”素质发展的表现，而同时也成了在广泛的范围内对学生发生影响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力，所以要把学习能力素质的培养渗透到学科教学的各个环节。

三、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对师范教育现代化的启示

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因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推动师范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一）全面审视师范教育的重要作用，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

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实施，使全社会认识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关键在师范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正如陶行知所说的，只有师范兴，教师兴，才能教育兴，国家兴。

教师是一项既高尚又专门的职业，教师专业化是必然趋势。我们要克服只要具有一定知识就可以当教师的片面和错误的看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是全社会的热切希望，也为教师专业化提出了迫切要求。教师专业化是适应新形势、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客观要求，也是师范教育现代化重要标志之一。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要建立统一的教师专业标准和严格的教师资格制度，组织相应的教师资格考试和颁发教师资格证书。随着国民整体素质的大幅度提高，普通教育师资的来源要由以培养为主转变为以选拔培训为主。

实现教师职业专业化，使师范教育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要加强对师范院校学生的培养工作，使其学历特别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都能达到从业标准。另一方面要组织实施非师范院校毕业生从教的教育工作，使其兼有专业学位和教师资格，还要开展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的资格认定工作。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

引入竞争机制，使教师队伍不断优化，现代化。

（二）重新整合师范教育培养目标，使教师素质综合化

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培养目标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它体现了师范教育的专业特性，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培养有生活力教师的教育目的，体现了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对于今天下午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师范教育改革，培养合格师资仍具有借鉴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发展，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有必要借鉴陶行知师范教育培养目标的思想，重新设定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要求师范教育培养的学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有机结合于一身。确立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特别要注意：第一，专业素质与文化素质相结合，使教师的培养建立在较宽的学术视野的基础上。第二，突出师范素质教育的重要地位，使学生具有为人师表的职业特质。第三，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为学生今后为人处事、教书育人打下坚实基础。第四，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使学生既有从教的知识，又有从教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有强烈的敬业精神，科学的教育理念，追求真理的品性，优良的人格特征，好学习、善创造、讲奉献、为人师表，能够适应21世纪教育的需要。

（三）建立全方位师范教育培养体系，使师范教育结构多元化

陶行知的广义师范教育思想为我国目前调整师范教育结构提供了新的教育和视野。我国现行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主要分成以培养新师资为主的各类师范院校教育和以训练在职教师为主的教育学院、进修学校、广播电视教育等师范继续教育。这样的师范教育结构模式，总的来看存在着不够完善、不够灵活的地方。一是重视新师资的培训而忽视在职师资的继续教育；二是重视教学

人员的培养而忽视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三是重视学历教育而忽视素质培养；四是重视学校教育人员的培训而忽视社会教育人员培训；五是重视正规化而忽视机动性。目前教育的发展又向师范教育提出了不少新的功能需求。首先是来自中、小学在职教师学历水平提高的趋势；二是对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干部的培养要求的提出；三是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继续教育，在学历、实践经验达到一定水平后，要求科研型的进修，为培养新型的教育专家服务。为了克服目前我国师范教育功能缺失的问题，以适应教育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借鉴陶行知广义师范教育思想，确立新的师范教育发展理念，变“终结性师范教育”为“终身性师范教育”，变“知识传播型的师范教育”为“知识催生型师范教育”，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层次、一体化的师范结构，纵向沟通，横向联系，协调发展，形成整体优势，以实现符合全部学制的需求的目标。

（四）全面提高师范教育质量，实现教育过程现代化

当前我国教育正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是一场深刻的教育革新，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素质教育是当今社会文化，特别是生产发展、科技发展水平及其趋势对学校教学客观要求的反映。目前师范教育也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轨压力，我们有必要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来构建现代化的师范教育模式。一是师范教育要确立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的发展意识。

我国现代化建设既为师范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给师范教育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素材。二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的教育环境。知识、才能、个性已成为确立教育目标的三个支点。现代教育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个性。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是生活的主体，而生活的真谛就是自我选择，人的这种主体性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产物。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丰富个性的教育环境，其中重要的是在教育中必须把师生关系放在一个民主、平等、友善和合作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三是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过去以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主、教师为中心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建立一种新的开放式教学模式，使课内与课外结合，实行多渠道施教；知识与能力结合，倡导实践出真知；实行主导与主体结合，坚持学生本位观念。

陶行知师范教育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并且自成体系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借整的价值，我们应从实际生活出发，创造性地加以应用。陶行知说过，先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同样，我们对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也要力求有所发展和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创我者生，仿我者死。

作者系江苏大学陶行知研究会会员

原载《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改革》，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诗如歌的育才学校专业组(连载之七)

文/孙朝云

七、开创边疆舞运动的舞蹈组

人少贡献大的舞蹈组

育才学校舞蹈组是学校七个专业组成立最晚、人数最少、年龄最小的一个组，而她对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4年9月，应陶行知先生的聘请，戴爱莲辞去了在国立歌剧学校和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任教的工作，到育才学校舞蹈组任主任，增设舞蹈组，她说她要教贫苦儿童学舞蹈，要培养中国专业的舞蹈演员。她确定了舞蹈组以学习中国舞蹈为宗旨。她从原歌剧学校带了5个学生：彭松、隆徽丘、黄子龙、卓凤凤和吴艺，前4个均做育才的老师，吴艺年纪小仍做学生，并在育才学校六组中挑选学生进入舞蹈组学习。于是在10月17日那天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育才学校舞蹈组的招生启事，称“本校创设舞蹈组，并聘舞蹈家戴爱莲女士主办。所招学生年龄要在12岁以下。”11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记者采访陶行知聘请戴爱莲到育才学校创设舞蹈组的原因。1945年9月9日，舞蹈组招来8个学生，女生是鲍如莲、姜敏、韩宗



舞蹈组首任主任、舞蹈家戴爱莲

隆、张韵新、张丽琳，男生是肖化成、唐南宁、陈宗。除了鲍如莲大一点有十四、五岁，其余均在十岁上下。

舞蹈组先后只有老师10余人，先后有戴爱莲、彭松、叶宁（百苓）任主任，有吴晓邦、盛婕、隆徽丘、黄子龙、卓凤凤、吴艺、杨帆、沈传芷（育才上海时期）、胡蓉蓉（育才上海时期）等担任教师。学生10多个，大型的舞蹈活动和演出都是在音乐组、戏剧组等的配合协助下完成的。舞蹈组人虽然少，他们却为中国的舞蹈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戴爱莲所说：“育才学校可以说是中国舞蹈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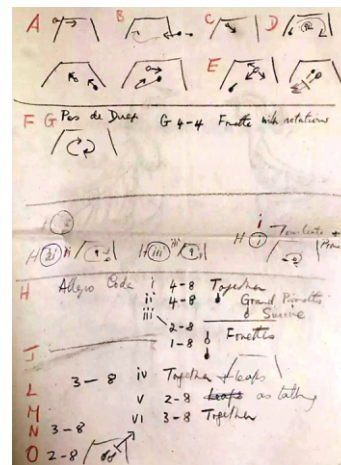
戴爱莲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小小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祖籍广东鹤山（今称新会）。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编导家，舞蹈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

1930年，她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曾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鲁道夫·拉班等学习芭蕾舞、舞蹈表演理论和舞谱。后来又投奔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等学习现代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戴爱莲在伦敦多次参



拉班舞谱的发明者鲁道夫·拉班

加中国运动委员会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筹集抗日资金举办义演，自编自演《警醒》《前进》等舞蹈，歌颂中国人民抗战精神。1939年9月3日，她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路程，决心用自己的舞蹈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春宋庆龄在香港会见



戴爱莲手稿：舞蹈《鸭子求爱》平面路线图

她。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她取道澳门到桂林，随即参加支援抗战募捐演出活动，创作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舞蹈《游击队的故事》《卖》《空袭》《东江》和《思乡曲》等，对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6年8月，戴爱莲和叶浅予离开重庆去美国讲学，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民间舞蹈。育才舞蹈组相继由彭松、叶宁任主任，除教同学的基础课程外，又排练了反映当时生活的《乞儿》《猴戏》《弃婴》《火苗》以及《快乐的人们》等一批新节目，并多次到工厂、学校演出，深得好评。



1947年6月3日，育才学校艺术组师生抵达上海后，在兰心大戏院举行第一次招待会合影

育才学校于1947年春季迁校上海大场，舞蹈组随行。育才为了在上海扩大影响，于1948年春节前，由戏剧组、音乐组、舞蹈组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联合公演。关心育才学校的进步人士和文艺界的许多朋友都前去观看，连演三日，座无

虚席。田汉先生在上海《新民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对育才三个艺术组的联合演出倍加鼓励，对《乞儿》《猴戏》《火苗》几个舞蹈称赞不已，特别赞扬戴爱莲先生在育才学校开辟的这块舞蹈园地，舞蹈幼苗已经在成长之中，边疆舞运动也在学生运动中展开，中国新舞蹈艺术，辉煌发展的前景已露出了曙光。

掀起扭秧歌热潮

舞蹈组成立后，戴爱莲和她的助手彭松等一面认真上课，教练舞蹈基本功；一面搞创作，编排新的舞蹈。

舞蹈组仅组建二月余，由于教师认真教，学生勤奋学，就和音乐组联合与1944年11月3日至8日在抗建堂举行音乐舞蹈晚会，这也是舞蹈组的首次公演。共演出6场，戴爱莲亲自编导了9个舞蹈，音乐组伴奏。还演出了小提琴独奏、钢琴独奏。演出非常成功，首次演出的民族舞蹈节目受欢迎。演出的收入用作招收舞蹈组新生的经费。《新华日报》在11月5日发表了《育才的音乐舞蹈会》为题的“本报特写”。12月3日又在沙坪坝举行以舞蹈组为主的公演。戴爱莲表演了新疆土风舞、西藏舞等节目。演出大受欢迎，使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了中国自己的少数民族舞蹈。



戴爱莲在重庆表演的舞蹈《思乡曲》剧照

1945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7周年纪念会，延安来了的新秧歌队，演出陕北的秧歌和延安的新秧歌剧，育才学校音乐组陈贻鑫、杜鸣心、杨秉孙应邀为《兄妹开荒》《一朵红花》《朱永贵负伤》等节目伴奏。陶行知出席了纪念会，戴爱莲带了舞蹈组的彭松、叶宁、隆徽丘和其他同学去观摩学习，受到很大的启发，使他们为之精神振奋。戴爱莲惊喜地说：“我以前

只在戏曲里看到汉族舞蹈，人家都说，汉族没有民间舞，这秧歌就是汉族的民间舞啊！”这场演出的导演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乐队的指挥是《新华日报》馆秘书长徐迈进。



戴爱莲表演独舞《哑巴背跛子》剧照

陕北的秧歌和延安的新秧歌剧，给育才各艺术组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育才以舞蹈组、戏剧组、音乐组联合发起，成立了育才秧歌队，掀起了一个学秧歌、排新节目的热潮。每天早晨起来，庄严大哥敲着锣鼓点子，大家自由参加，在露天的土台上学习秧歌舞步，戴爱莲先生是边扭边唱，边唱边教，热情洋溢。她借鉴和创造力很强，时常花样出新，还编了一个秧歌舞《朱大嫂送鸡蛋》，庄严先生编了秧歌剧《王大娘补缸》、大型秧歌舞蹈表演《抗战八年胜利到》等节目，戴先生回忆道：“1945年我们去重庆新华日报社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和大秧歌，回校后我们也创作了一个大秧歌。我们这个大秧歌不但在学校演给老乡看，有一晚我们从学校古圣寺一直扭到草街子镇上，秧歌队领头的是我和彭松，后面是育才学校广大师生。锣鼓队就是庄严大哥带头组织的，那晚浩大的秧歌队、洪亮的锣鼓声，火把照亮了黑暗天空，真是震动了寂静的小山镇，那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使人难以忘怀。后来我根据秧歌剧形式编了一个秧歌舞《朱大嫂送鸡蛋》，庄严大哥以后还编了《王大娘补缸》秧歌



1946年1月舞蹈组和音乐组学生在《新华日报》8周年庆祝会上表演秧歌剧《王大娘补缸》

剧。这些节目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2月上旬，育才秧歌队在学校门口的广场上演出一场后，就到草街乡各村去巡回演出。秧歌队到哪里，人群就跟到哪里，形成了一支轰轰烈烈的宣传队。每走到一处演出，那里就像赶庙会一样热闹。几天的演出，非常成功，老乡们一个劲儿地夸奖秧歌队。在庆祝抗战八年胜利到来的那天晚上，她领着全校师生，提着自己做的灯笼、火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从古圣寺出发，沿着崎岖山路扭秧歌扭到草街子乡，附近的农民也加入了扭秧歌的行列，边扭边唱：“抗战八年胜利到呀，敲起锣鼓放鞭炮……”

在育才所开办的几十个识字班里，不仅教农民和儿童读书识字、还教他们扭秧歌和唱革命歌曲，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

在红岩村时，八路军办事处多次请同学们去礼堂参加晚会，表演节目，同延安来的同志一起扭秧歌。



1946年育才师生与重庆《新华日报》职工共同演出秧歌舞

1946年12月至1946年2月的重庆反美抗暴运动大游行中，地下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组织的育才游行队伍和秧歌队、采莲船等，通过多种活动进行反美、反蒋的宣传，在南区公园集中的短暂休息时，育才同学在邹容烈士纪念碑下集体跳秧歌舞，各校同学欢声雷动，齐声高呼：“育才同学跳得好！再来一个！”其他学校一些学生也纷纷加入秧歌舞行列。

1949年12月1日，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三校师生，怀着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敲锣打鼓，扭起秧歌，高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欢庆重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大家从红岩村

出发，一直游行到小什字，最后把这面五星红旗插到了抗战胜利记功碑上，使山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重庆一解放，重庆人民广播电视台就邀请育才学校去演播了《兄妹开荒》，还演出秧歌剧《一朵红花》等节目。

杨武能校友在《“山那边呀好地方”——追忆重庆育才学校》一文中说：“记得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当晚的营火晚会以及第二天的庆祝游行，完全是师生自发举行的。富有革命传统的育才学校，以此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敏感和政治热情。讲到了游行，我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大早，便排着队，唱着歌，举着旗——国旗红旗以及育才蓝底白图案的校旗，精神抖擞地，意气风发地，向着大约十公里以外的市中心走去，不时地还跳起大秧歌。育才大秧歌！育才的游行队伍！在解放初年的重庆城，育才的游行和育才的秧歌乃一大景观，所到之处真叫万人夹道，市民们一次次地老也看不够。我记得游行的组织者跳大秧歌的高手，是后来当了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贾培基。至于队伍中不起眼的小不点儿我，也学着像马驹撒欢儿似的尽情蹦跳，在围观民众赞赏、欣羡的目光中，心里洋溢着育才学校学生的无比自豪。”



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师生上街游行庆祝重庆解放。（图中所举旗帜即为育才学校和红岩小学师生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

戴爱莲先生说，“秧歌就是汉族的民间舞啊！”“育才学校培育了中国民族舞蹈。”1946年至1947年，她应美国国务院所邀请，作为中国艺术家之一访问美国，他每到一处讲学，都把中国的民间舞蹈介绍给美国人民，还应邀在纽约巴比仁普里扎音乐厅、布鲁克林音乐剧院等演

出中国的民族舞蹈，轰动美国，连旅美的大导演司徒慧敏也拉来乐队为她伴奏，非洲民间舞倡导者拉·梅丽派出学生乔治等，穿戴中国边疆服饰为她配舞。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

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蹈大型晚会，最早诞生在于1946年3月的重庆，由戴爱莲领导的育才舞蹈组师生演出。

由于之前舞蹈组的教学和演出取得的成功，1945年6月，戴爱莲计划到边疆去搜集少数民族舞蹈，寻找中国舞蹈的根，进一步提高教学和演出的成效，陶行知支持戴爱莲出去采风。戴爱莲与叶浅予、彭松一道启程，叶浅予负责画少数民族服装，彭松负责记录音乐。他们先到成都住在画家张大千家中，等候摄影家庄学本来做向导。直到7月庄学本也未到，彭松就和华西大学去川北做社会调查的两个学生一道



舞蹈家戴爱莲与画家叶浅予

同去川西北的羌族和嘉戎藏地区采集羌族等民间舞蹈。后来戴爱莲和叶浅予就去了康藏（打箭炉）藏族地区采集藏族等民间舞蹈。彭松8月份回到育才，戴与叶11月下旬才回到育才。采风回校就开始整理、创作、排练新节目，准备用三、四个月搞出一台边疆舞演出。戴爱莲创编了藏族舞蹈《巴安弦子》《坎巴尔汗》《春游》《甘孜古舞》《弥勒佛》和彝族舞蹈《保保情歌》、维族舞蹈《坎巴尔汗》，重排了《瑶人之鼓》《哑子背疯》等。彭松创编了《端公驱鬼》和《嘉戎酒会》。这时正好新招收来8个学生，女生是鲍如莲、姜敏、韩宗隆、张韵新、张丽琳，男生是肖化成、唐南宁、陈宗。除了鲍如莲大一点有十四、五岁，其余均在十岁上下。

师生一道经过三个月的排练，1946年3月6日起，由戴爱莲为指导、由中国民间乐舞研究会、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西藏文化促进会、新疆同乡会联合主办、育才舞蹈组演出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共演出了5天8场。这次演出的海报是叶浅予先生设计。



叶浅予先生设计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海报

演出的节目有戴爱莲编导的《瑶人之鼓》《傩傩情歌》（彝族舞）《春游》（藏族舞）《巴安弦子》《坎巴尔汗》《青春舞曲》（维吾尔族舞）《马车夫之歌》《甘孜鼓舞》《哑子背疯》（根据桂剧改编）以及从藏戏中学来的《弥勒佛》《戴大头和尚的面具》，彭松编导的《嘉戎酒会》《端公驱鬼》（羌族舞）和《拉萨踢达舞》等，具有非常浓厚民族色彩的舞蹈，音乐组伴奏。这是首次在中国舞台上公演了瑶、彝、羌、藏、维等少数民族的舞蹈，轰动了整个山城。接着于3月30日至4月7日，在中央公园民众教育馆（现人民公园）又公演了9天11场。舞蹈组新招的8名同学都参加了这两次的演出。



戴爱莲、鲍如莲、隆徽丘、彭松表演《傩傩情歌》（彝族舞）

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等对边疆舞演出的评论和报道成了报纸的新闻中心。1946年5月23日《新华日报》对《农作舞》的评论文章认为：“它是那样

的健康，那样的线条刚劲而色彩明朗，是劳动人民的颂歌，是新民主政治度下农民生活的轮廓。”“听到这轻快的旋律，更坚定认定：不能有一瞬间放弃为争取民主生活权利的斗争！”一些学校如沙坪坝的南开中学、青木关的音乐学院等邀请育才舞蹈组去演出，一些学生亲自到育才去学边疆舞，学了回去在校园里就普及开了。



戴爱莲、彭松表演的《坎巴尔汗》

1946年6月，戴爱莲在去美国访问讲学途中，在上海短暂逗留。便应邀在上海豫园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连续演出了四场“边疆舞”，引起巨大轰动，风靡整个上海。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同学们，也纷纷跳起了“边疆舞”。从此，秧歌与边疆舞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个上海人，冲击着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在1949年5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上海人民正是以“敲起锣鼓、扭起秧歌”的形式庆祝上海的解放，使得整个上海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戴爱莲先生说：“经过边疆采风 and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我初步找到和实现了我回国寻找舞蹈之根的愿望。”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演职员合影（前排右3为舞蹈组主任戴爱莲）

如今，那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开创了中国民间舞蹈舞台化的先河，已成为中国当代舞蹈的奠基之作。70年后，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当代舞蹈艺术研究》主编刘青弋这样说：“这场晚会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创新价值载入中华民族舞蹈的史册。如今，创造这一历史的代表人物戴爱莲、彭松、隆徽丘等育才学校的教师们先后驾鹤仙逝，然而，他们创造的历史则值得后人不断回顾。在这场晚会的编导戴爱莲、彭松双双诞辰100周年和“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发表70周年纪念日的年份，重新钩沉这段历史，审视其历史上的文化创新和社会影响力及其成因所在，对于反思当下我们民族舞蹈的舞台艺术在外显的“繁荣”局面之下，社会文化影响力却不足以匹配的根源所在，之于启迪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当下和未来建设与发展，增强文化创新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心灵创编的时代歌舞

育才学校舞蹈组在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里，独立创作，或与音乐组、戏剧组一道创作，演出了数十个节目，他们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时代，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力量，许多节目轰动重庆山城，而《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舞蹈已载入中国舞蹈的史册。



1946戴爱莲在纽约表演的《瑶人之鼓》

独舞或三人舞《瑶人之鼓》，由戴爱莲戴爱莲创编，戴爱莲、彭松、隆徽丘表演，彭松配乐。

独舞《青春舞曲》《哑子背疯》，由戴爱莲自编自演，音乐组陈貽鑫、杜鸣心、杨秉孙等组成乐队伴奏，其中叶浅予为鼓手。

三人舞《卖》，由戴爱莲创编，隆徽丘、黄子龙、程代辉表演。表现了穷人骨肉分离的痛苦。

秧歌舞《王大娘补缸》，原为河南民歌，由庄严填词、编曲以秧歌舞演出，是曾经轰动重庆山城的二人表演。先由彭松和戏剧组女同学胡奉文排演，后由李乃忱排练，戏剧组王万恩、刘卯钊表演，效果依然很好，成了出场次数最多的保留节目。



舞蹈组演出的《朱大嫂送鸡蛋》

秧歌舞《朱大嫂送鸡蛋》，由戴爱莲编舞、配曲，陶行知填词，舞蹈组吴艺扮演朱大嫂，彭松、隆徽丘、黄子龙扮演战士，原为崔牛作曲。

秧歌舞《抗战胜利八年到》，以陕北秧歌的形式，变成了在舞台上演出的大型秧歌，气势宏大，非常动人。由庄严作曲，杰泥作词，舞蹈组、音乐组、戏剧组联合演出。

四川民间歌舞《莲箫》《彩船》《花灯》，由隆徽丘组织排练，庄严指挥乐队，舞蹈组、音乐组和戏剧组的同学演出。

四川鼓书《王婆骂机》（方言剧），由戏剧组吴振邦同学创作，自编自演。骂的是抗战胜利后美国飞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助纣为虐。语言



彭松和育才舞蹈组表演的《弥勒佛》

诙谐有趣，很受欢迎。

湖北旱船调《划龙船》，由戏剧组周竞同学编写和主演。内容很灵活，到什么地方就用当地素材，反映当地问题，极富活力，后来也成为主要节目。

舞蹈《思乡曲》，在现代舞中采用中国古典昆曲的动作元素，首次引入了中国风格。由音乐组教师马思聪作曲，舞蹈组戴爱莲先生编舞并表演，马思聪乐队伴奏指挥。

舞蹈《游击队的故事》，由戴爱莲编导，叶浅予为舞台监督，丁聪笛子伴奏，冯亦代负责后勤工作。



彭松（左二）编导并表演羌族舞蹈《嘉戎酒会》

藏族舞《巴安弦子》《弥勒佛》《甘孜古舞》《春游》，由戴爱莲改编并演出。

维吾尔族舞《坎巴尔汗》《青春舞曲》，由戴爱莲编导并演出。

羌族舞《嘉戎酒会》《端公驱鬼》，由彭松创编，戴爱莲、鲍如莲、隆徽丘、彭松表演。



吴晓邦创编并表演的舞蹈《饥火》和《思凡》

《思凡》《饥火》《网中人》《生的哀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由吴晓邦

创编并演出。

三人舞《乞儿》，塑造了三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流落街头、无依无靠、饥寒交迫、骨瘦如柴的孩子。由彭松编导，韩宗隆、张丽玲、陈如九表演。音乐是选用《柏木扁担》民歌曲调作，哀婉凄凉，感人泪下。

讽刺性独舞《猴戏》，借用猴子耍把戏的形式，演一个小猴子在锣鼓声中戴上不同的面具表演：有发国难财的奸商，有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有勾搭美国兵的交际花，有国民党的打手。寓美于丑，用夸张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反面人物的心理丑态。由彭松编导，年纪最小的学生肖化成扮演。

独舞《弃婴》，表现一个逃难妇女因流亡的艰难处境，不得不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时的矛盾心情和内心的痛苦。由彭松编导，年纪最大的学生鲍如莲扮演。

舞蹈《火苗》，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一缕火苗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由聚到散，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蕴。由彭松编导，舞蹈组全体同学表演。



育才学校生活中的《农作舞》
(1947年拍摄于上海大场余庆桥)

舞蹈《快乐的人们》，由彭松编导，姜敏等表演。

舞蹈《向民主小姐求爱》，用面具舞的手法表现，用陶行知先生同名诗朗诵伴奏。由彭松编导，舞蹈组先生表演。

这些歌舞，给人们留下的是社会历史的痕迹，时代的印记，心灵的震撼！

作者系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原副校长

中共引领的重庆救国会活动始末

文/胡平原



重庆文化救国会演出抗日剧目

重庆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引领下，将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井井有条，轰轰烈烈。重庆救国会，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救国会的组织成立

1931年“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借口“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全力推行反共内战和压制抗日力量。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到1935年5月，川渝地方党组织除个别保存外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同时，重庆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受到极大的扼制。日本侵略者已进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当震惊中外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重

庆各界民众积极声援。譬如《商务日报》和《新蜀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呼吁广大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于12月24日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随即派出学生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6项要求。热血青年纷纷走向社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同时，“重庆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了《告本市学生书》，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也拒绝为日轮、英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国民党当局极力压制爱国学生运动，强令解散学联。但是学生中的进步骨干，仍然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同时，在温嗣翔编辑的《商务日报》副刊，也聚集了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他们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随后《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又开展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吸引了职业青年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编者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报，互相鼓励。《商务日报》接获从巴黎直接寄来的《救国时报》刊登的《八一宣言》，在进步青年中暗地传阅。几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领会了党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主张，加之又受到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启示，他们便开始共同酝酿准备秘密成立



救国会学习的《救国时报》

重庆救国组织。

1936年春天，从苏区脱险出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他通过投稿方式结识了温嗣翔和他周围的进步力量。他们汇集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二·九”之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大家决定组织救亡团体。于是，1936年6月8日，在漆鲁鱼寓所正式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候野君、温嗣翔（温田丰）、陶敬之、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候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开始后，继续吸收了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当时鉴于公开学联被解散的教训，决定救国会为秘密的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在人民群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救国会成立不久，共产党员张曙时通过刘传福与漆鲁鱼（时任《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通气，对救国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了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救亡力量联合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结合起来开展活动。在这个正确思想指导下，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陆续在学生、职业青年中和文化、妇女界都建立了组织，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救国会的组成发展

重庆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

界救国联合会”四个团体组成。其中除文教是公开的以外，其余的都是秘密组织。另外，在他们周围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重庆救国会成立时只有干事会和少数会员，在举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后（山付为《商务日报·副刊》“商副”的谐音），吸收了第一批新会员。



重庆学联救国会骨干成员

学生救国联合会，最初是由漆鲁鱼直接领导各校组织活动，没有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后来由于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等活动，需要统一活动，因此，1936年11月成立了秘密的学救机构。由刘传福任主席，温嗣懿负责组织，罗焯铺负责宣传，学救活动的方法是利用各学校的公开、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开展救亡活动。当时学生联系的公开团体有：二女师的学生自治会、高工校的暴风歌咏队、巴农校的耕耘研究会、省女职校、巴男中、巴女中、育才学校、明诚中学等校的读书会。以及一些学校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等。利用这些团体的名义吸收进步和中间状态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选择积极分子个别参加救国会。通过广泛的活动，学救迅速在各校发展了组织。当时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校占优势的有20多所，使学生的活动主要掌握在学救手中，学救是救国会下属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它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起着先锋作用。

职工救国联合会由干事会干事陶敬之（时任

《商务日报》记者兼《公共园地》编辑），将《公共园地》联系的一批职业青年（主要是银行职员、练习生、商店店员、学徒）组织起来于1936年7月19日成立。成立之前，大家进行酝酿，共同决定：为了避免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的麻烦，秘密职救的对外名称是半公开的“职业青年读书会”。成立时选举产生理事5人：翟廉为理事长、赵湘植负责总务、丁雪松（丁屏）负责宣传、李郁生负责教育、杨帆负责组织。另外，根据干事会决定：职救与学救共同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改造了少年部举办的“民众歌咏会”，成立了“自强读书会”。随后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青年新闻学会”，广泛开展抗日歌咏、读书、讲演等活动。后来为了运用一个群众最容易接受的名词，更广泛地团结职业青年，于1937年7月18日以秘密职救为核心，以银行职员、练习生和公司职员、商店店员为主要成员，成立了公开的“青年职业互助会”，以代替原来半公开的读书会。



文化救国联合会部分会员

文化救国联合会是经过半年多酝酿，根据上海、成都的先例，由《商务日报》副刊、《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社、春云社等报刊发起组织，于1937年5月16日成立。成立大会选出金满成、漆鲁鱼、黄宇齐、肖崇素、陈彝荪、温嗣翔、李华飞、毛一波、候野君、赵铭彝、李开先、陈凤兮、许可经、刘稚德（沙金）等为理事，推选金满成为主席。抗战爆发之后，救国会系统的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为了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文教”于同年11月23日改名为“重庆市文

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在文教和文协领导下，先后举办了1937年暑期文艺讲习班，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课余农村宣传队”“怒吼剧社街头演剧队”。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动摇，要强行解散文协。经过谈判，1938年1月27日，文协改为“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除演剧队外，其他各团体逐渐转为隐蔽活动。

妇女救国联合会于全面抗战前夕已经着手酝酿筹备，1937年8月2日正式成立。这是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而成立的。“妇救”的领导成员有丁雪松、陈奇雪（陈红藻）、陈玉和、吴永英、朱斯白、王光娣、闵庶佳等。随后，“妇救”利用合法名义，于8月16日公开成立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为利用宋美龄的慰劳会的招牌去抵制各界抗敌后援会对抗日力量的控制，便于12月1日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妇救会的骨干都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形成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有执委会，负责人是进步文化人士李兰。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各界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救国会在全面抗战前的活动

全面抗战前夕，国民党禁止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非法，救国会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为了在秘密状态下打开救亡运动的局面，救国会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合法阵地。后来，舆论阵地还逐步扩大到了《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救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把要求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在此基础上，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主要有以下具体活动。

学习党中央文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救国会成立后，文化界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他们通过外地的党员和国外进步刊物，获得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互相传阅，并翻印散发宋庆龄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和斯诺的著作《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传播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特别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在漆鲁鱼的领导下，组织救国会骨干成员学习、领会、讨论、宣传中共中央制订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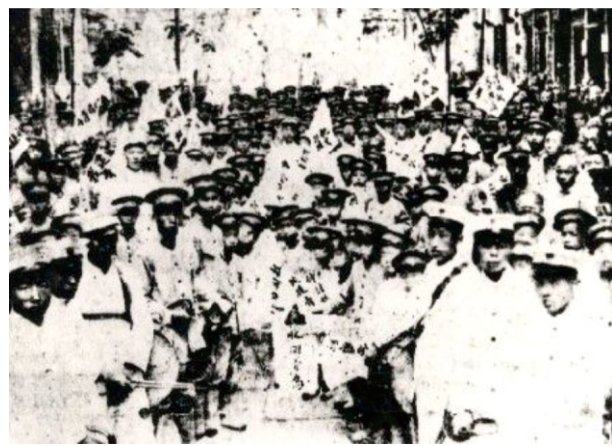
举办“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1936年7月12日至8月16日，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举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90多人。讲习班只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主要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通过讲习班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讲习班结束后吸收了20多人参加救国会，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先锋力量。

反对日本非法在成都设领的斗争。1936年8月，日本力图把侵略势力延伸进四川，妄想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川渝人民坚决反对。因此，成都和重庆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荡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重庆于8月18日在巴县党部召开了“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分6个组，分别向党、政、军当局请愿，并组织60个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刘湘都想利用这场斗争互相削弱对方，都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和爪牙参加这个反日机构。救国会也通过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带领职教骨干赵湘植和杨帆，参加了这个反日机构的工作。日本人岩井到重庆，曾打算组织游行示威，没有成功，

但广泛发动了学救、职教成员参加并领导了一部分宣传队，大张旗鼓地到各地开展宣传。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请愿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挫败了日寇在蓉设领的政治阴谋。同时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于1936年10月逝世，噩耗传来，人们万分悲痛。而国民党当局却力图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鲁迅的前半生。救国会决定通过纪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并且以鲁迅为旗帜号召组织起来。于是，在《商务日报》副刊从10月24日至29日，连续6天刊登了《追悼鲁迅先生专刊》。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先生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的下半截被新闻检查所“免登”。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扩大鲁迅先生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取得广泛支持，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鲁迅先生追悼会于11月1日在重庆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学校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共300多人。为争取合法，由温少鹤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了话，热情地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先生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

援助绥远抗战募捐。1936年11月，傅作义部



学国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队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救国会在《商务日报》的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20余人，郑重刊出启事，发动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教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仅3天就捐得8000余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县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献。救国会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势图》，在重庆市出售、宣传，将所卖的钱全部捐献，这一次抗日募捐活动，对抗日军队是有力的支援，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的救亡行列。

此外，还举行了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为避免暴露和遭到镇压，救国会采取了统一部署，分散宣传和散发抗议信函。对“西安事变”也作出了正确宣传，又进行了救济四川旱灾募捐。并组织了慰问队到刘湘办的反省院，慰问绝食的“政治犯”，使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久，由于形势的变化，反省院也解散了。这一系列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正确的方法，为下一阶段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救国会在全面抗战后的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救国会通过各个纪念日，充分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其活动具有以下特色。

1937年“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救国会发起举行了由800人开始，最后汇集到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周年纪念，救国会联系的14个青年团体，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纪念会和上千人参加的火炬游行，轰动了整个山城。1937年至1938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特别频繁，救国会系统的各个演剧队，协同陆续从外地来重庆的全国性戏剧团体共20多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约举行大型戏剧公演70多场次，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了日寇在

华罪行，同时，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观众达到几十万人。

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各救亡团体的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开展活动。如遍及城市、农村演出街头剧，张贴壁报、漫画、慰劳、募捐，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以及邀请中共吴玉章、邓颖超和知名人士沈钧儒、史良等主讲的定期讲演会等，各种形式紧密结合，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七七”之后，救国会利用每个国耻纪念日和“三八”节、“五一”节、“双十”节、戏剧节等节日和假日（如星期日和学校的寒暑假），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活动。以此同时，活动不断深入。各救亡团体不仅活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和娱乐场所，而且深入到农村的田坝、山坡。不仅活跃在山城的城区和郊区，而且远征到重庆的东、西、南、北。不仅活动在学校师生中，而且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以及工商界人士、甚至华侨巨商。

1937年11月，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了17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宣传，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和街头讲演，引起了广大工人、家属、男女老少的共鸣。

1937年秋，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救国会骨干应考参加了宣传队，到下川东7个县宣传演出，沿途深受群众欢迎。再如：1938年6月，国民党川军67军奔赴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了“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到鄂东平原向部队和沿途群众宣传、演出，并在67军举办了学兵训练班，在学兵中培养了一批抗日宣传积极分子。

抗战爆发后，抗日成为合法，各种救亡团体随之成立。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成立了官办救亡组织“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八一三”之后，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这段时期抗日阵营中的斗争更

为复杂，救国会因势利导，利用合法名义，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注意保持“救国会”组织的秘密性的前提下，将救国会系统的分支机构挂上官办组织的衔头，或者派救国会成员参加官办组织，掌握部分领导权，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条件，使救亡运动更加公开化、合法化。

譬如，1937年底文协被迫解散后，于1938年1月利用抗敌后援会的合法名义，成立了“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又如，1937年12月，妇救利用宋美龄的慰劳会的招牌，成立了“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再如，1937年10月利用庆祝“双十节”的名义，由“战时书报供应所”出面，邀请40多个学校、团体参加，借用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办的英年会大厅举办的抗日壁报展览等。这一时期，救国会在复杂的斗争中，渗透到许多公开、合法的救亡组织，巧妙地推动着救亡运动的工作。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38年底。

救国会的重要作用

重庆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成立、发展、活动，是在中共党员漆鲁鱼等领导下进行的。它在重庆抗战革命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救国会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成立了重庆救国会，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树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依靠民心，领导民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这就使抗日大后方的重镇重庆，

并未因党组织被破坏而中断反日爱国斗争，而且从“一二九”之后兴起的群众运动，还能持续地发展下去形成高潮，为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在重庆全面开展活动打下基础。同时，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不仅遍及山城，而且扩大到附近县区和川东一带，它为促进川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输送了新生力量。救国会于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分批输送了100多名会员和青年去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日前线。他们经受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若干转折的锻炼和考验，这些会员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为中共重庆党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庆救国会不仅注意宣传党对抗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积极引导抗日骨干学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辩证法入门》《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读物。同时，经常宣讲党的基本知识和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因此，使抗日骨干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许多人初步具备了党员的入党条件，这就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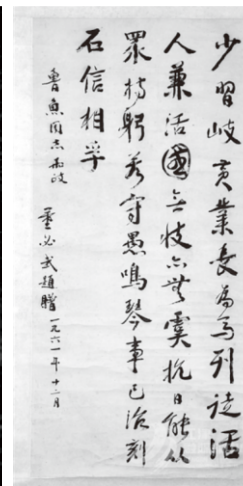
1937年底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在党的组织大发展中，救国会成员是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到1938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而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革命新生力量。

重庆救国联合会在抗战史上所起的积极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8年5月，在抗大召开过一次重庆去延安的救国会成员座谈会，抗大主任张际春同志听取了救国会的汇报，并在会上讲话给予肯定和鼓励，会后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请求中央派去干部加强领导，得到肯定的答复。在抗大第四期的毕业典礼上，李富春同志在讲话中肯定了救国会的成就。

1961年12月，董必武用遒劲的笔力在宣纸上题诗：“少习岐黄业，长为马列徒。活人兼活国，无伎亦无虞。抗日能从众，持躬若守愚。鸣



重庆救国会领导人漆鲁鱼



董必武为漆鲁鱼题诗

琴事已治，刻石信相孚。”对重庆救国会领导人漆鲁鱼给予了高度总结和评价。共产党员漆鲁鱼善于结合当地革命群众，并团结其他（她）地下

党同志，创建并正确地领导了重庆救国会，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绝贡献。而救国会成员陶敬之、李茂林、刘鸣寂、饶友瑚、鲜国学、周国仪、袁美云、何贵前等同志，在前线、在监狱同样为革命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值得党和人民永远敬仰和纪念。

1984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4）22号通知指出：“重庆救国会是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其成员的革命工龄应从参加之日算起。”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

戴伯韬：给周恩来写信呼吁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吴海涛

【按】如果说叶圣陶先生是人教社的创始社长和第一代精神领袖，那么他之后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就是戴伯韬。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人教社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老戴挺身而出，不顾古稀之年、身患严重的冠心病，也不顾再度遭受政治迫害的巨大风险，直接致信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最终促成了人教社的重建和新生。

戴伯韬（1907-1981），江苏丹阳人，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任社长、总编辑。

戴伯韬一生经历充满着传奇。他是陶行知的第一批成名弟子，长期追随其左右，在民国教育界和科普学界有着独特的地位。随后，他又成为新四军开创的苏北解放区文教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是我党



戴伯韬

红色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在调来人教社之前，他曾先后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和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是党内知名的教育专家和管理人才。

戴伯韬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学派——陶行知教育学派的主要传承者之一。1927年，戴伯韬投考了陶行知创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称晓庄学校），成为晓庄学校的第一期13名学员之一，也是后来学界公认的陶门弟子代表性人物。

30年代，他追随陶行知在上海等地积极推行科学启蒙教育，倡导“科学下嫁运动，以救国于危亡”，办杂志、开展教学试验、撰写科普文章和出版书籍。这期间，他以“白桃”笔名，撰写、出版了《水的科学把戏》《显微镜》《望远镜》《雨虹》《云雾观察记》《霜和雪》《风》《奇异的光》《奇异的声音》等儿童科学丛书9种11本。他和董纯才（陶门弟子，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一起为中华书局编写了小学自然课本，合编了农业常识课本，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写了一套图文并茂的《大众科学丛书》，还在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了60多篇供儿童阅读的自然科学作品。他是我国早期优秀的科普作家，以辛勤的笔耕，为中国科普事业奠基开路。

抗战爆发，戴伯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在武汉、重庆实际主持《战时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参与发起成立“抗战教育研究会”，积极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办“游击训练班”“战时训练班”等系列活动。其后，研究会又与中国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联

系发起成立了包括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内的教育界统一战线组织——“全国战时教育协会”，戴伯韬任协会常务理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为了“培养人才之幼苗，为整个民族来造就人才”，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32岁的戴伯韬成为育才学校的实际负责人，并秘密担任了中共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党组成员，经常向周恩来等上级领导直接汇报工作。

40年代初期“皖南事变”之后，戴伯韬受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的委派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等人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先后任华中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盐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第一厅厅长、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他通过自己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大批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教育和争取了不少青少年，为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苏北解放区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5月，他随解放大军接管上海，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为恢复整顿和发展上海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工作成绩卓著，1949年9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戴伯韬（二排右三）和叶圣陶（二排右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4年，戴伯韬奉命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实际主持日常工作。在他与叶圣陶社长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人教社的

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54年6月，戴伯韬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机构及领导的决定》，获教育部批准。这个规划实际上是为建国初期如何进行中小学教材建设奠定了基本的原则和方向。

在叶圣陶、戴伯韬等人的共同领导下，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真正自编的中小学教科书。1960年和1963年，人教社又分别编写出一套十年制和十二年制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此外，戴伯韬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组织建设，为教育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培养一支教材编辑、教育研究队伍，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人教社老人们的回忆中，戴伯韬是一个典型的干工作不要命的人。他性子比较急，事情一经抓起头，就要一抓到底。60年代曾担任人教社总编室主任的张玺恩深有体会，有时候一个文件经过讨论，指定张玺恩打一个草稿，周六布置下去，让下周一拿出来，谁知星期一一早他就走到门上来，问起草得怎么样了。在这样的不断磨练下，张玺恩等人就很少有星期天了。戴伯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五年也培养不出一个优秀的编辑”，他对编辑干部的要求严格也是出名的，不徇私情，不讲面子。曾经有一位编辑在审阅课本大样时，看走了几行，以致造成了政治性错误。戴伯韬亲自主持会议，由这位编辑先作自我检查，而后是室主任，责任副总编辑也作了自我批评。最后，他把责任归于自己，并谈了深刻的教训，指出了该怎样改正。这样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编辑干部对提高业务素质都抓得很紧。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那些年月里，人教社办公楼里一到夜晚总还是灯火通明，很多编辑都在认真工作，刻苦学习，一支能挑重担的教科书编辑队伍也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戴伯韬身上有解放区老干部求真务实的作风，他非常重视一线的调查研究，并经常亲自带队下基层。有一次，他带领几位编辑远赴江苏丹

阳县的一个农村，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蹲点调查。调查以前，先花了近一周的时间，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中央指示，讨论调查目的，商量具体工作要求，安排调查日程。随后，他要求大家以一所乡村的中学和小学为点，从学生、教师、领导，一直调查到周围的农民家庭。从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家长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一直到农民的家庭经济情况，都作了周密的访谈。调查之后，又征求了县、乡行政领导的意见。调查组在小学里搭伙，和老师们吃一锅饭，没有特殊化。每隔三、五天，戴伯韬都要亲自写汇报，寄给中宣部、教育部的领导。由于过分劳累，有一次竟然在厕所旁晕倒了。这次调查所得有50万字，回来后经过整理，举办了专题展览，让全社同志都有所了解。



戴伯韬（右三）带队深入江苏丹阳农村学校进行调研

十年“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各项事业受到了很大摧残。1969年全社干部、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已经被停职审查的戴伯韬也“戴罪”前往。他的身心在干校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中受到极大损害，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1971年，人教社被宣布撤销，编辑人员分配至全国11个省份。面对这样的情景，戴伯韬非常痛苦。他痛惜十几年培养起来的一支教科书编辑队伍要被拆散，一批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文书档案要被毁掉。人教社老编审张玺恩回忆：“十年浩劫，出版社干部被分配到各地工作（指从“五七”干校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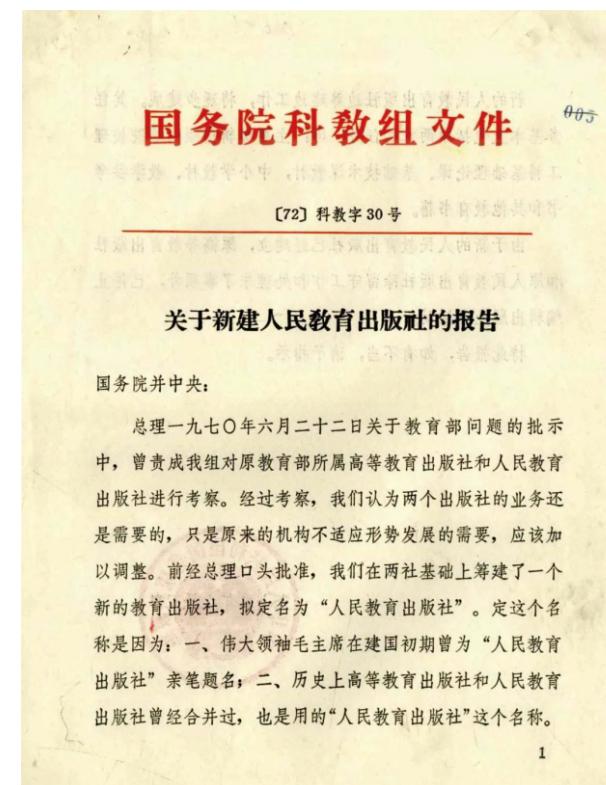
业分配）。临行前，戴伯韬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有什么包袱，如果有人要提起以前的教材，你们可以说，那是在戴伯韬的领导下编写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不负责任。’大家含泪听着，默默无言，不久就这样分手了。但是老戴并没有忘记多年朝夕相处的同志们。他有个小本本，一直携带在身边，本子上写满每个同志的名字、新的工作单位。闲下来就翻开看看，数一数人数，然后就神情惨淡地长叹那句‘五年也培养不出一个好编辑’。但他无能为力，只好把小本本再揣进口袋里。”戴伯韬一直惦记着这些星散各地的同事，经常通信，鼓励他们不要放弃信心。原俄语室编辑高宇征从干校分配到安徽一所中学做教学行政工作，心情一度低落，戴伯韬就常写信安慰她。高宇征说：“令人感动的是，他几次用颤抖的手亲自给我写信，告诉我专业不对口正好是找机会调我回出版社的好理由，让我耐心等待。后来我调到了安徽省教材编写组工作。”

1972年3月，一封“人民来信”辗转呈送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写信人这样介绍自己：“周总理，在您百忙中，占用您的宝贵时间，心里实在不安。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曾用名白桃，现用名戴伯韬。1938年至1941年1月，在重庆任中共全国救国联合会党组成员，常向您请示汇报工作。1941年1月，蒋匪帮发动皖南事变，您指示我到新四军去工作。您可能回忆起我来……原听说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否撤销要观察一个时期，心想可能还有立功赎罪之机。去年底，出版社撤销，原编辑人员大部分分配了，心情很沉重。我认为这些人经过“五七干校”锻炼，有各种学科专门知识和多年来积累的正反面编辑经验，选择其中一部分人继续调查研究或编教材还是可以的”，在这封信中，戴伯韬力陈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没有一家国家级教科书研究、编写机构，不能没有一套由国家统一编写的通用基本教材，也表示培养一支强有力的中小学教材编研出版队伍绝非易事，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信的末尾署名为“中共党员 戴

伯韬”。是的，凭开国总理超常的记忆力，他一定会记得在重庆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戴伯韬，他曾对这位陶行知的得力弟子有着深刻印象。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苦撑危局的同时，一直默默关注着为国家教材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教社。接到戴伯韬的这封信之后，他马上责成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关措施，加快工作步伐。在目前人教社社史馆保存的一份1972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文革”中履行教育部等职能的机构）起草的文件中，显示了这样的信息：“总理1970年6月22日关于教育部问题的批示中，曾责成对原教育部所属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进行考察。经过考察，我们认为两个出版社的业务还是需要的，只不过原来的机构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调整……前经总理口头批准，我们在两社基础上筹建了新的教育出版社，拟定名为‘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终于获准重建。戴伯韬被调回北京领导筹建工



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报告

作，任筹备组组长。他以备受病痛折磨之身，毅然挑起这副重担。为抽调编辑干部、物色领导干部四处奔走。从六、七个人到二、三十个，再到一百多个，逐步扩展，队伍不断壮大。但在筹建过程中，为确定人教社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等问题，他与国务院科教组“四人帮”势力的百般阻挠进行了不断抗争，导致冠心病愈发严重。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了，人教社也迎来了真正的新生。1977年，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教育工作，确定重新编写统编教材。戴伯韬无比兴奋，他不顾自己病重，为教育事业拨乱反正忘我的工作。在之后的四年中，他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建、为新的全国统编教材编写、为课程教材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始终带病坚持工作，日夜操劳。同时，他也在为开展教育科学和开展课程、教材、教法研究，大声疾呼，先后撰写了36篇学术文章。1979年，他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在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望，1980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时戴伯韬被推选为副会长、全国教育学会理事长。1981年3月，戴伯韬因病去世。



戴伯韬（中立者）在人教社建社30周年庆祝大会上

2009年，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选戴伯韬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之一。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主任

人才济济！陶行知朋友圈里的“汇文书院”校友

文/张铭

20世纪初，“教育救国”的理念风行于当时的知识界。在清末“新政”的推动下，很多仁人志士都认为：“中国尚有一丝希望，全在振兴教育。”我们在研究创建于135年前南京汇文书院21年短暂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汇文书院最后一批学生中，涌现出一批以陶行知、刘伯明、陈裕光、姚文采、徐养秋、赵叔愚、谢家声、陈桢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学成后纷纷投身兴办教育的行列，艰辛办学，辛苦培人，为近代中国的教育、经济、政治的发展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汇文书院

时至今日，这些大师们剩下的只是隐隐约约的背影，但仍然是我们难以逾越的标杆。今以《陶行知教育朋友圈里的汇文校友》一文，把陶行知身边那些崇尚“教育救国”的同学、同事和好友们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拿出来晒一晒，以资纪念。

陶行知，中国教育史上大师级的人物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安徽歙县人，系晚清汇文书院最后一届校友，也是民国初年金陵大学第一届校友。作为一名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其一生创办过许多类型的学校，并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



陶行知（1891年—1946年）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陶行知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



金陵大学首毕业生合影（后排左三为陶行知）

习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

刘伯明：倡导人文主义理想教育的教育家

亲密关系：汇文书院同学、金陵大学校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一起受业于杜威，南高师同事。

亲密指数：★★★★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哲学家、教育家。祖籍山东，后移居南京，早年受业于章太炎。南京汇文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先后赴日游学，赴美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陶行知一起受业于杜威。

刘伯明学成归国后专心教育事业，当时汇文书院改名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延刘伯明为国文部主任，教授哲学、哲学史、文学、教育学等，声名顿著。

江谦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延刘伯明兼任伦理、哲学、语言等课教授。1919年刘伯明辞去金陵大学教职，专任南高师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

任。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改为东南大学，刘伯明任副校长，代理校长等职，除忙于校务外仍兼文理科主任，哲学教授，讲学不倦。

刘伯明除精通英文外，并通法文、德文，且并习希腊文与梵文。1922年美国思想家杜威来南京讲学时，陶行知与刘伯明轮流任翻译，信达流畅，听众欣服。

作为教育家，他对学生关心、爱护备至。刘伯明重视学风建设。有人评价，在他管理下的南高东大学生勤奋读书，“学风之良，为全国第一”。在金陵大学任职期间，所得兼课收入薪水全部捐给金大图书馆购置图书。在东南大学，他特地为贫困学生创立了贷学金助学法。

1923年刘伯明积劳成疾，是年夏仍应邀去湖南讲学。同年秋突患脑膜炎，医治无效逝世，年仅37岁。胡适曾挽以联曰“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东南大学于1924年特以南高院大会堂命名“伯明堂”以资纪念，为全国高校为学者设立纪念堂第一人。

陈裕光：金陵大学首任华人校长

亲密关系：汇文书院同学、金陵大学校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

亲密指数：★★★★

陈裕光，号景唐，浙江宁波人，1893年出生于南京。1905年，进南京汇文书院成美馆。1911年顺利考入金陵大学堂化学系，并于1915年从金陵大学堂毕业。

1916年，陈裕光因学业优异，被金陵大学堂选送赴美留学深造，初入美国克司工业大学读书，不久就转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专业，并于1922年夏获得博士学位。陈



刘伯明（1887—1923）

裕光在美国留学长达6年之久，他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还曾主持创办了《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和《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他还是美国化学会的会员。

从美国归国之后，从1923年至1925年期间，陈裕光先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和教务长，并曾两度代理校长，还曾兼任学校评议会主席。

1925年，陈裕光应母校金陵大学盛情之邀，回到阔别10年的金陵大学出任化学系教授。



陈裕光（1893—1989）

1927年国民大革命风暴中，全国掀起收回教育主权运动。11月，金陵大学理事会推荐陈裕光成为金陵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他在金陵大学校长的职位上达23年之久，可以说是中国担任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金陵大学。

1929年和1945年，陈裕光校长曾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育奖章和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了公立金陵大学，年近古稀之年的陈裕光完成了他在私立金陵大学的历史使命。1989年4月19日，96岁高龄的陈裕光终于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姚文采：与陶一起创办安徽公学的教育家

亲密关系：安徽同乡、汇文书院同学、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同事、安徽公学（南京六中前身）合伙人、国立国术学院、晓庄师范同师、反蒋斗争战友、陶行知称他为“亲兄弟”、去世后相伴长眠。

亲密指数：★★★★★

姚文采，原名姚蕴丰，1893年生于安徽歙县。幼年家境贫寒，免费就读于教会崇一学堂，与陶行知同学。后在陶行知鼓动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先学医，后改学生物。

1917年，陶行知留美学成归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教授兼教务长，聘姚先生担任该校生物学、解剖学讲师。并由著名生物学家秉志推荐，担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

1923年，在南京的安徽同乡发起筹办安徽公学，当即组成校董会，聘请陶行知、姚文采为正副校长。



姚文采（1893—1958）

1927年，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师范，姚先生竭力配合，并义务担任晓庄师范的生物课教师。1930年左右，陶先生在孝陵卫新建国立国术学院，聘姚先生教解剖学。

为了工作方便和节约时间，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乘着在四校之间来回奔走。

1930年4月，国民党当局查封晓庄师范，陶行知出走日本，姚先生等几十名师生被捕。后经张治中（安徽中学校董）保释，接任安徽公学校长。姚文采甚至为克服教育经费拮据的困难，曾变卖私有房产补充办学经费，使该校维持不辍。在南京市会考中，安徽公学多次名列前茅。

1937年，日军空袭南京。姚先生将安徽公学迁至屯溪，自筹经费，租赁校舍，购置设备，维持学校正常教学。1939年，安徽公学改名安徽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又迁返南京复课。

陶行知生前曾向其子陶城感怀：姚文采、许士骥是自己引为亲兄弟的两个人。

新中国成立后，姚文采担任安徽中学、市六中两校合并后的南京市第六中学首任校长。为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1958年病逝前，他还一直在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学岗位上发挥余热。

陶行知所归葬的墓地及姚文采本人墓址，是姚文采生前一手选定的。两处墓址距离他们并肩战斗过的晓庄师范原址靠得很近。这对生前离多聚少的好兄弟，百年后依然相伴在一起。

徐养秋：中西学问都好的一代鸿儒

亲密关系：汇文书院同学、金陵大学校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

亲密指数：★★★★★

徐养秋，字则陵，江苏金坛人，1887年出生。四岁入私塾，十五岁远赴武昌进方言学堂。1904年，返乡参加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徐养秋先生返回武昌入博文书院。1906年入南京汇文书院继续学习西学，1910年入金陵大学，期间与陶行知共同创办《金陵光》杂志，被公推为首席中文编辑。1914年与陶行知一起毕业。1917年赴美留学，先就读于伊利诺



徐养秋（1887—1972）

大学研究院，获史学硕士学位，1918年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史学及教育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成民国一时名流，时誉“中国少有的中西学问都好的几个人之一”，其史学造诣及教育业绩堪称大家。

1920年，徐养秋学成回国，任职于安徽省教育厅。不久，他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教育科主任，讲授教育史课程。南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继续担任教育系教授兼主任。与他同事有陶行知、陈鹤琴、陆志韦等。

他大力支持陈鹤琴主张，以“东南大学教育科学实验幼稚园”的名义创办了鼓楼实验幼稚园，还为这所幼稚园组建了董事会，通过社会募捐活动给予资助。

1922年前后，陶行知倡导设立平民读书处，

他立即在自己家中设点试验；并热情支持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的办学活动，以“晓庄”二字作校名就是他为陶行知所取，意思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1922年加入由蔡元培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3年陶行知辞职赴京，先生接任教育科主任并教育系主任。并亲自主持创办了东南大学附中，推行新学制，开创了我国中等教育的新体制。

1927年任安徽教育厅一科科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任委员，从事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并参与重新签约工作。同时受聘为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与李小缘等人携带研究所重要图书转移到大后方。战后全部运回金陵大学，为保存宝贵的图书文献做出巨大贡献。

1938年抵成都，继任金陵大学原职。1939年任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教授。1940年兼任贸易委员会研究员。1944年任交通部主任秘书。1946年重返中央政治学校任外交系教授并教务处副主任。1947年受中央大学邀请，返回南京任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不久晋升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1949年冬辞去院长职，任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52年成立南京师范学院，任教育系教授。1950年代，他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

1972年8月病逝于南京，享年八十六岁。他胸怀坦荡，品格高尚，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勤勉躬耕，惠泽桃李，造福桑梓，当为后人铭记。

赵叔愚：杰出的乡村教育家

亲密关系：汇文书院校友、金陵大学校友、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国立东南大学同事、乡村师范学校合伙人。

亲密指数：★★★★★

赵叔愚，著名乡村教育家，1888年生于河南新乡。1908年就读于金陵汇文书院。1913至

1914年间，赵叔愚辍学，后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191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

毕业后赵叔愚担任直隶省实业厅农业视察员。1922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乡村教育，1924年获硕士学位。

赵叔愚回国后先后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和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赵叔愚为主任。同年5月，成立“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赵叔愚为五人设计委员会主任。

后与陶行知共同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后，分设第一院和第二院，赵叔愚担任第一院院长。

1927年初，赵叔愚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设在苏州的民众教育院院长，同年8月，他将民众教育院由苏州迁至无锡，专心于在乡村生活中实施民众教育。

然而，谁能料到，仅仅一个月之后，病魔突袭，死神垂顾，赵叔愚不幸英年早逝，享年仅40岁。其人远去，其事未竟，然而他“情系乡村农民命运、尽瘁乡村教育事业”的事迹和精神，今天仍感动着我们，历史则将永远铭记。

谢家声：现代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先驱

亲密关系：汇文书院同学、金陵大学同班同学。

亲密指数：★★★★

谢家声（1887—1983），植物病理学家、教育家。安徽无为为人。1910年，毕业于汇文书院成美馆，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与陶行知同班）。后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农学院深造植物病理学，获硕士学位。1918年又到康奈尔大学进修。



赵叔愚（1888—1928）

谢家声学成归国后，1920—1921年任金陵大学农林科副科长，1923年兼东南大学农业推广部主任，1925年又兼东南大学农科教务主任，一度代理主任。

1930年金陵大学农林科扩充为农学院，由谢家声任首任院长，达8年之久。1931年4月接管燕京大学农科，翌年农艺系设农具组，植物系设昆虫组。金陵大学农学院采用“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推动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

谢家声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先驱，他是民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创始人之一，第一任专任领导人，任职10年之久，为组织全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确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全国农科界的领先地位。

1935年12月，成立全国稻麦改进所，谢家声任所长。中国试验农学开始由单科独类性研究提高而进入了系统全面性发展。他还于1935年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副院长职务。

1935年6月20日，谢家声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首届30位评议员之一，并被推举为评议会规程起草七人委员之一，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和评审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1946年谢家声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农业部主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任务不仅要从事直接救济，而且要帮助战争受害国人民尽快恢复本国必需品的生产和服务。谢家声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积极开展和参与国际农业科技交流，在国际农业界有一定影响。

陈桢：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

亲密关系：汇文书院校友、金陵大学校友、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东南大学同事。

亲密指数：★★★★★

陈桢，出生于江苏省邗江县瓜洲镇。因家庭贫困，仅断续地读了几年私塾。1909年，他在南京汇文学院小学部和预科分别学习了一个学期。1914年，考入金陵大学农林科深造。1919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他仅用了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康乃尔大学预科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全部课程。1921年夏，陈桢专门师从摩尔根继续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的深造。他是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从事遗传学学习和研究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陈桢院士（1894—1957）

1922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1923年开始金鱼遗传的研究工作。由于教学

中缺少合适的中文教材，他编著了《普通生物学》，于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

1933年他编著了影响深远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发行后风靡全国，20多年中共出版了159版，成为公认的通用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对我国生物学人才培养和中学的生物学教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北平研究院评议员。1952年，担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桢是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长期从事金鱼遗传与变异的系统研究，以及动物行为学和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

1957年11月15日，病逝于北京。

原载“方志江苏”微信公众号。

许士骥与陶行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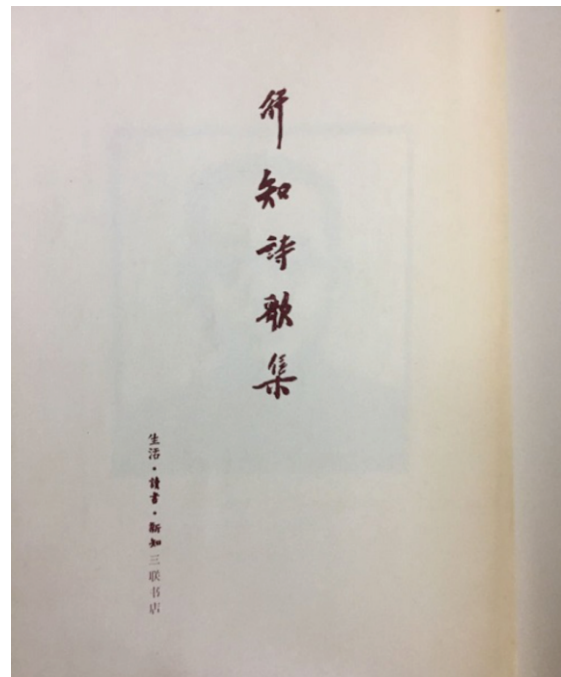
文/许唯物

我父亲许士骥和母亲贝聿珩的书画展，从8月22日起在被称为“文化一条街”福州路上的“上海笔墨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这次展览不同往常，受场地限制，作品只能以小尺幅镜片为主，但不少书画和图片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再加上其中有不少个人经历和史料，反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两老的工作、生活和艺术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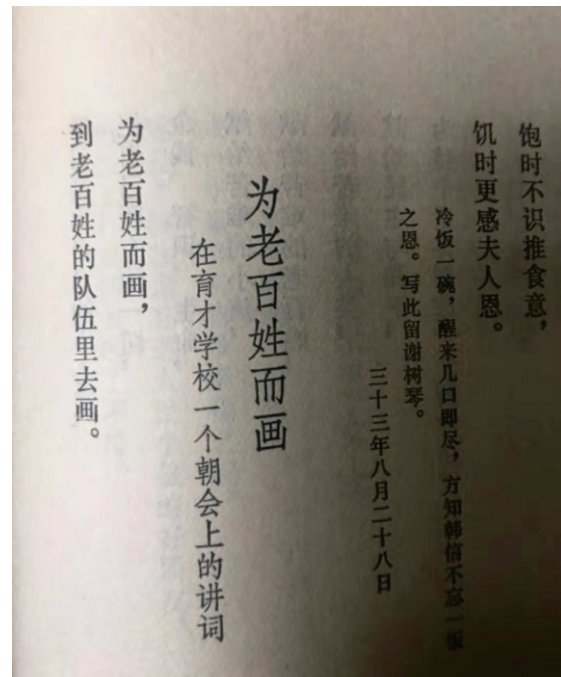
父亲是安徽歙县人，与陶行知先生是同乡挚友，都是十六七岁就离开故乡外出学习、谋生。虽然他学习的专业是绘画艺术，但受陶行知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极大。陶行知先生有一首诗谓之《为老百姓而画》，他写道：“为老百姓而画，

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画老百姓，画老百姓的爸爸，画老百姓的妈妈，画老百姓的小娃娃，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作息奋斗，画出老百姓之平凡而伟大”。父亲知道后奉为至理名言，马上抄录下来，随身携带。近百年过去了，这些话在现在来看也不过时，画家应该到百姓中去，要深入生活，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会接地气。这次画展中的国画“农人”“码头工”等就是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代表作。父亲很重视画大众喜闻乐见的图画，创作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早年陶行知先生曾看到父亲画了一幅东汉高



《行知诗歌集》



《为老百姓而画》

士严子陵先生像，当即提笔题诗一首“垂竿古渡头，无饵亦无钩，鱼儿爱知己，群来竿下游”。父亲非常高兴，以后还以此诗画了“鱼乐图”等多幅作品。父亲曾经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回国后画风为之一变。他有素描、油画等西洋画的基本功，但是又从来不简单西洋化，而是在扎实的传统根基上“化”了“西洋”，充分糅入到民族优秀传统之中，进而形成了自己浑朴、醇厚、静穆和大气的风貌。

陶行知先生毕生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放弃高官厚禄，投身于平民教育。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重庆“育才学校”和上海的“山海工学团”等学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父亲追随陶行知先生，不仅应邀去学校义务任教，而且在学校经费发生困难的时候积极组织画展卖画支教。在这次展览中所展出的“育才之友国画展目录”中，就有著名大师徐悲鸿一下子拿出十幅画来帮助重庆育才学校，可见当时艺术家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事业的热情和境界之高。

这次展览会上还有一件珍贵的展品是一九四六年陶行知先生写给我们家的亲笔信，这也是他最后一年在上海住在我们家的文字记载。不久，由于长期奔波劳累，陶行知先生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父亲闻讯后立即赶去并受郭沫若先生和家属的委托，当场为陶行知先生复制了手模和面模以供后人瞻仰。陶行知先生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



陶行知的脸模和手模

“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曾说过“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如今他的手模、面模已被评为国家革命文物，连同他的“手脑相长歌”成为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同时，为了继续弘扬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精神，在陶行知先生逝世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父亲回到故乡，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利用自家的祖宅办起了一所让贫苦孩子能够读书的义务小学，这就是当时全国第一所以陶行知名字命名的“歙县行知小学”，受到家乡广大劳苦大众极大欢迎。每当同父亲谈及当年办校和孩子们的故事，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并表示这只是他们这代人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而应该做的一个实际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父亲从南京大学被调往上海筹建“中央卫生部医学模型制造厂”，并任厂长。其间父亲克己奉公、克服困难，运用自己在德国学习的专业知识，在王淑贞、颜福庆、倪葆春、沈克非、穆瑞芬等一大批医学专家的帮助下，组织设计、生产了大批医学教学模型，不仅及时供应国内各医学院校，还通过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销往海外国际市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模型厂同针灸专家陆瘦燕等中医界专家合作，开发研制了中国第一台光电显示“经络腧穴玻璃人”模型和“中医脉象”模型，填补了国内空白，荣获国家工业产品大奖。

今年是父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每当我缅怀起这些事迹和成就，回想起父亲在学习及工作中对待困难的态度时，就会想起陶先生近百年前说过的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我想这就是父亲他们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和力量之源，也是他们终身不忘的初心。

原载《新民晚报》，2020年8月25日第21版。

让儿童的双手和大脑共同劳动

——陶行知劳动教育观点的时代意义

文/黄传慧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校掀起了开展劳动教育的热潮，但也存在对劳动教育认识不足等问题。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他的观点对我们开展好劳动教育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

现今，相当一部分家长和教师仍对劳动教育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见。在家庭里，家长教育孩子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去扫大街”；有时教师惩罚犯错儿童，就让儿童去为班级劳动——扫地、擦桌子、搬桌椅等。渐渐地，在这种错误的劳动教育观念和氛围引导下，儿童就会对劳动产生抵触心理，劳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教育者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劳动教育绝不是惩罚儿童的手段，而是锻炼儿童自立能力的重要途径。陶行知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自立立人歌》，其中第一段就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一个自立的“好汉”必须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而在现代家庭教育中，许多家长将儿童该做的家务劳动大包大揽，只要求儿童学习好、成绩高。长此以往，儿童也就渐渐养成了不劳动的习惯，自理自立能力也越来越弱。殊不知，书本上的学习倒不如通过动手劳动学习来得更快更实在。陶行知有一首劝儿童动手的歌谣——《一双手》：“天给我手必有用，精神全在‘做’字上。攀上知识最高峰，探

取地下万宝藏，铲除人间的不平，创造个世界像天堂儿模样。这些事没有完成，决不可把手儿放。”这首歌谣告诉我们，对于儿童的培养要手脑并重，培养儿童在动手“做”的劳动过程中攀登知识的高峰、改造未来的世界，将动手劳动视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二、认识到劳动教育对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

哈佛大学的学者曾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成年之后的就业率比例为15：1，犯罪率的比例是1：10。^[1]这是因为劳动教育对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动作技能、认知能力、社会性发展等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一定量的体力劳动，儿童体魄得到锻炼，为其他方面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次，不管是运用大肌肉、发展大动作的劳动项目——搬桌椅、推车子，还是运用小肌肉的精细劳动项目——穿针引线缝补衣物、择菜插花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儿童的动作技能，所谓“心灵手巧”就是通过动手劳动实现心的“灵巧”的。再者，儿童在劳动中必然会接触到各项事物，以促进他们认知的发展，如儿童去超市买菜，必然要学会区分韭菜和蒜苗，名字怎么写，消费多少钱等。植物鉴别、文字学习、口头计算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最后，儿童在参与家庭劳动或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势必要与人沟通、交流、合作，促进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让他

们不仅知道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有哪些路径，而且还能领悟与他人同甘共苦、共担责任的必要性。

三、劳动教育对于培养和发展儿童的创造性思维具有极大的价值

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不仅是劳动教育能够实现的效果之一，更是儿童对劳动感兴趣、主动劳动、持续劳动的关键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就在于儿童学习和最大的内驱力是儿童自身对外界事物的兴趣、好奇及其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在劳动学习过程中，解放手脚后的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和能力所长选择适合的劳动内容，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性使用身边的工具探索周围的世界，甚至可以不按既定的步骤创造性、高效率地完成劳动任务。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儿童必定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如何分析并解决问题？儿童的创造性思维锻炼就自然发生了。此外，在取得相应的劳动成果时，如种完一棵树、摘满一筐果实、完成一个作品设计方案时，儿童的自我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儿童会因此获得充足的个人成就感和自豪感。因此，劳动教育中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可以更好地满足儿童的兴趣与需要，使儿童的高阶思维、想象力、创造力等得到充分的发展与提升。

四、劳动教育要坚持让儿童“在劳力上劳心”

“在劳力上劳心”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观点一脉相承，就是“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所有的问题，都是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劳动教育的主题要从儿童实际生活中选取，不能脱离儿童的生活。在劳动教育的实施中，也要让儿童的双手和大脑共同劳动，将书本知识活学活“用”起来。书本不是只在课堂上使用的工具，而是生活中也可以使用工具，书本上的知识大都取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比如，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桂花雨》的课文，就是取材于作者小时候帮大人一起摇落桂花、收集桂花、晾晒桂花、储存桂花、做桂花

糕的劳动经历。如果学习这篇文章的学生正好居住在有桂花树的地区，教师在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就可以带领学生真正体会一下收集桂花的劳动过程，让学生更能理解和领会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感受，这就是在劳力上劳心——心随身动。

“书”是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陶行知认为，如果有一天一切教科书都没有了，那么无书可读的人也可以自己出去游历、去做实验、去做农活，那就会“少几个吃饭不做事的书呆子，多几个生产者、建设者、创造者、发明者”。儿童在“做”中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身心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的道理”。比如对儿童进行物品收纳的劳动教育时，可以引导儿童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物品分类或设计实用的收纳装备来提高物品收纳的效率，这就是“用心以制力”。总之，“在劳力上劳心”就是要坚持劳动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动手劳动与动脑思考相结合，而不是单纯的盲目劳动或脱离劳动空想办法。

五、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思维需要教师创造性的劳动

劳动教育教师的劳动不同于普通劳动工作者的劳动，这是因为教师的劳动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教师的劳动成果是人的学习和发展的，而不是单纯干完一项劳动任务。因此，比起面向确定对象和指向确定成果的普通劳动，劳动教育教师的劳动要复杂得多，劳动教育的实施需要教师更多创造性的劳动。首先，儿童的劳动学习是生活化、经验化的学习，而不是概念化、知识化的学习。教师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向儿童传授现成知识，而是通过选取和把握生活中的劳动教育主题，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让儿童手脑并用地在生活中学习、在经验中学习，通过真实的劳动过程掌握劳动的技能和经验，并培养和发展其思维。这对教师来说，无疑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劳动。其次，劳动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在其他学科教学中，教师可以较好地把控教学进

度和预知教学成果，而劳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具有更多的不可控性和不可预见性，儿童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各种不确定性考验着教师的教育智慧，需要教师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智慧劳动加以解决。因此，负责劳动教育的教师劳动需要创造性，而教师自身创造性的劳动也是对儿童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引导和榜样示范。

六、劳动教育要求教师 and 儿童打成一片

“真正的教育确实应该帮助造就手脑都会用的人。我们需要的一种教育，是造就脑子指挥双手、双手锻炼脑子的手脑健全的人。”陶行知不但是这么说的，而且是身体力行这么做的。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一片荒野上，陶行知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开学，面对“没有教室，没有礼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大地便是我们的屋基”的现状，陶行知整天头戴草笠，脚穿草鞋，带领师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身体力行“滴自己的汗，自己的事

自己干”，被前去探望的吴似鸿误以为他是“一个仁厚的农夫”。陶行知的劳动实践告诉我们，开展劳动教育，教师不能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而应该与儿童打成一片参与到儿童的劳动中去。首先，在与儿童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教师以自身的榜样作用实现培养儿童热爱劳动以及劳动光荣的价值引领；其次，教师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也能亲身了解和体验劳动课程设计的成功与不足，便于下一步改进教学设计；再者，在共同劳动过程中，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对儿童的劳动情况进行实时观察，并在发现问题后，及时以合作伙伴的身份进行协助和引导，更容易为儿童所认同和接受。

【注释】

[1]谁剪掉了孩子独立成长的羽翼[N].中国教育报, 2013-11-17(004).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博士
原载《人民教育》，2023年第10期。

新时代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探索与实践

文/杨玉砚

【摘要】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经验，其教育思想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学习陶行知先生，探索和实践生活教育课程，是把教育做出温度的有效路径。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思想，只要用心去体悟，用心去实践，就会铸成有趣而高尚的师魂，成就真实有效的教育。本文从教师、幼儿、家长三个方面介绍了新时代农村幼儿园的生活教育实践课程。

【关键词】新时代；农村幼儿园；陶行知；生活教育

《求是》2023年第18期《习近平：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中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进行布局，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就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能够从陶行知的教育观里找到一些思路与方向。

一、对于教师，在我们的新时代与陶行知的旧时代里，找到一致的目标

陶先生在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中，培养目标为五项：一是农夫的身手，二是科学的头脑，三是改造社会的精神，四是健康的体魄，五是艺术的兴趣。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与今天所提倡的“五育并举”一致。要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就要先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老师。我们农村幼儿园的老师，尤其需要达到陶行知先生提倡的“五项目标”。

（一）农夫的身手

农村幼儿园的老师，就要跟农村人打交道，跟广大的农民朋友打交道。比如，一个班级开展“种荞麦”活动，整个一学期都在荞麦田里劳作，从开始播种到最后收割，都是和农民朋友一起愉快合作的。家长们看到教师也是懂农活、爱农村、敬农民的，他们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心地带领孩子耕作、陪伴孩子成长。

（二）科学的头脑

农村幼儿园的科学课往往是短板，每每到发达地区去参观学习，最羡慕人家在科学领域的教育是那么高大上，感觉是“望尘莫及”的。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咱农村的“科学素材”，又是欣喜若狂的。我们带孩子探究“冬天的菜园”，在冬天的菜园里快乐成长，孩子们播种从一把一把地埋到一粒一粒地放，从拔杂草到排水，哪一项工作不是科学探究呢？

（三）改造社会的精神

我们地处农村，需要改造的是什么呢？需要改造的是“幼儿园孩子要提前学习小学知识”的观念，需要改造的是“孩子就应该无条件听家长的话”的思想，需要改造的是“小孩子只要读书厉害就可以了”的认识。那么，“小先生制”“小孩不小”“生活即教育”等思想就是我们要在农村幼儿园大力提倡并推广的。

（四）健康的体魄

体魄不健康，生活怎么美好？生活不美好，怎么会有美好的教育发生呢？农村幼儿园完全可以每学期都有体育赛事，以赛促炼，以炼促健，师幼共炼，师幼共健。体育比赛除了拔河跳绳拍皮球，还应增加项目和形式，不仅赛幼儿，也要赛教师。

（五）艺术的兴趣

千万不要以为农村缺少艺术，你去看看春天的栅栏、夏天的麦垛、秋天的辣椒串儿、冬天的花围脖，哪样不是咱农村人的原创艺术呢！唱歌跳舞画画都是艺术，编织堆砌耕耘照样是艺术。教师要有艺术的志趣，要有艺术的美梦，要有艺术的追求，才会带出有志趣、有美梦、有追求的孩子。

只要真正把这五大目标抓住了，农村幼教，农村幼师，农村幼儿，都将在“五育并举”的行知路上越来越蓬勃！

二、对幼儿，在我们的新生活和陶行知的苦生活里觅到相似的诗意

常言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实，真正的好生活、好教育，真正的诗意与远方，就在当下的每一天，就在眼前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陶行知先生是一位富有诗意的人，在他的从教生涯里，也为儿童带去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诗意。如何让儿童拥有诗意的童年呢？

（一）让儿童爱上阅读，是最直接又最有效的途径

儿童的阅读不是必须要识字可以进行的，阅一张图，读一块标识牌，都是阅读。儿童在还不认识字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通过看图画来阅读故事，他们甚至可以用图画来书写故事。

当今时代，我们农村也是可以开展“线上阅读群+线下阅读区”模式的阅读活动的。孩子的阅读真的很神奇，孩子们不认识字，他们却可以通过看图说话的阅读方式把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那就是孩子说的故事与绘本本来的故事相差甚远，但这并不影响孩子阅读的乐趣和意义，至少孩子们沉浸在故事里的美好体验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这种美好体验，就是诗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他们对图画的理解，就是一种美妙无比的诗意。

（二）教师把自己变成童诗

陶行知先生教导我们说：要把自己变成儿童。我们深知，儿童喜欢和同龄人交朋友，如果我们幼师不能变成儿童，就不能走近儿童，更不可能走进儿童的心灵，成为儿童的朋友，以至于无法让有效的教育发生。要让儿童拥有诗意的童年，幼师得把自己变成童诗。

1. 爱上阅读，沉淀深厚的诗情。教师自己爱上阅读是让自己有诗意的基本条件。有人天生就具有诗情，可是大多数人的诗情是从阅读中逐渐沉淀出来的。

2. 尝试创作，析出鲜明的诗才。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沉淀出的诗情，会催生创作的热情与动力，在创作的热情与动力下，经常尝试创作，慢慢地就会形成诗才。我们把自己创作的童诗奉献给儿童，让儿童朗诵，在朗诵过程中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与理解进行删减、增添、改编，又形成新生童诗，或者说，儿童修改之后的才是真正的童诗。

3. 把自己变成童诗，释放浓郁的诗意。当你的诗才在参与儿童生活的过程中闪闪发光的时候，当你看山是诗、看水是诗、看人也是诗的时候，你自己就是一首“童诗”了。当自己成为诗意满满的老师，儿童就会被你的诗意所熏陶，即使她以后成为理工生，其身上也会不失儿童时代

积淀下来的诗书气质，成为一位更加完整的人。

三、对家长，在我们的新农村与陶行知的旧乡村里，遇见同样的真情

陶行知先生历尽千辛万苦，致力于普及教育运动，他主张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科学知识变成空气一样。2022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教育促进法》施行，我想我们幼儿教师，尤其是农村的幼儿教师就应该学习陶行知那样，把科学育儿理念变成空气一样，让人人得之，人人享之。

也许一个教师准备好了一场专题分享，发起报名，但应者寥寥。这种时候应该想：就算只有一个人愿意来，我也会认真准备，多一个人关注和了解也是好的。要一直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坚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并受益。

比如，我曾经也是遇到过发出热情广告但回应者甚少的情况。很欣喜的是，报名已经结束了，接到一位小学校长的电话，他向我询问这个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我坦白地说了这只是一个分享，分享的是我学到的东西，不是我自己原创的东西，川大的邱昌建教授给了我启发和引领，我想把这份收获传递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焦虑抑郁，以至于掌握一些调节情绪、引导孩子的方法，尽量减少我们生活中的焦虑抑郁者，或者

尽量减轻焦虑抑郁的程度，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这位校长谈到自己对生活实际中存在的抑郁症的重视与担忧，说愿意来一起交流，并且带两个人来一起交流。我想，这就是教育人共同的使命感，我非常开心。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是农村幼儿教师，我们要学习陶行知先生，我们不仅要“和马牛养鸡犬豕交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我们还要与书为友、与读书人为友、与追求健康的身心的读书人为友，与广大家长为友，铸就高尚师魂，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做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杨冰. 陶行知与儿童教育,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2] 周洪宇. 陶行知教育名论精要,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7月.

[3] 魏智渊. 《儿童读写三十讲》,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4月第一版.

本文系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幼儿园教育研究中心项目课题《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的探索实践研究》【批号: NYJ20210619】研究成果

作者系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黄琅镇幼儿教师

以系统性评价改革构建良好区域教育生态

文/陈如平

过去10年间，浙江省承担了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直面现实、锐意改革，创造性地构建了“三维质量评价”体系，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成为教育评价改革的先行省份。

在教育评价改革中提出的生态取向的教育质量观很有前瞻意义。

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长足发展，但学生学业负担较重、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仍在较大范围存在，深入探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不正确的教育质量观、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的消极影响。浙江省提出的生态取向的教育质量观抓住了当前基础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强调以优化教育生态为目标的教育评价改革，“优化促进学生成长的环境与机制”，既针对时弊，又尊重规律；倡导并坚持“四个关注”——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学生的学习品质，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关注影响学生成长的环境因素。这正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对端正教育质量观，改进教育质量管理，指导教育的科学发展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教育评价改革中构建的分层承责的“三维质量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坚持评价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但简单的评价不科学，科学的评价不简单。浙江省提出的“三维质量”的分层承责模型既简

明扼要、纲举目张，又坚持了评价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亮点在于从县域、学校和学生三个层面分别提出评价体系，三者均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又各有侧重，彼此协调、相互联结。把握三个层面的区别十分重要。浙江省提供的分层承责模型是《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具体化。他们构建以结构型质量为关键的区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以过程型质量为核心的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与改进体系，并以健康发展为结果型质量的基础导向完善学生发展评价。这样的“三维质量评价”既辨析了不同层面质量的实质，同时使得教育改进更具针对性，为《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落地创造了一条符合实际、可行的路径与方法。

在教育评价改革中通过教育质量监测深层次推进教育教学改进的系统设计具有很好的创新意义。

在很多地方将教育质量监测主要定位为管理手段的背景下，浙江省积极探索质量监测的教育教学导向功能，通过监测传达教育教学导向，引导教育教学改进。他们构建了“学生发展+成长环境”的指标框架与分析模型，形成了“一年监测，两年改进”监测工作体系，通过数据挖掘形成许多有价值的教育建议，转化为教育改革的指导。如初中聚类分析提出的指导学校分类发展的建议，融入“初中提质强校工程”；基于数据实

证提出的学校教学管理转型的建议，深度影响了学校实践；关于学习品质与主观负担感受的分析深层次揭示了学生成长机制，引领教育教学改进。这些都是基于监测内容、工具、分析的较好的系统设计，特别是不少监测建议转化为行政决策，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如对科学实践能力的监测，推动了实验开出率与专职师资配备率迅速提升；结构型质量被纳入县域教育生态监测与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体系，作为反映区域教育发展优质、均衡、公平状况的指标，较好地体现了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政策导向。

在教育评价改革中探索的旨在提高学校自我改进能力的“学习质量调查”颇具推广意义。

评价改革必须落实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的问

题诊断和方法改进。浙江省在教育评价改革中将工作重点从外部监测转向学校内部，从外控转向自控，用评价引导教学。浙江省提出重建学校教学管理机制、学校教学管理转型和学生成长机制转变的实践架构，直接指向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管理行为。特别是杭州市上城区借鉴教育质量监测技术建立诊断与改进的学习质量调查和区校互动的分析反馈机制，很好地体现了综合评价的思想，是区域性统考的转型实践，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长环境，促使区域性统考从“管理立场”向“学校立场”转变，从“比较施压”向“诊断改进”进化。

原载《中国基础教育》，2023年第8期。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文/覃延鑫

【摘要】中国迈入新发展时期后，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也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在“大思政”格局下，高校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体系有助于助推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因此，本文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分析高校现存育人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创新育人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大思政”；课程思政；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一、“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必要性

(一) 应对当前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复杂形势

思想工作，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学校作为推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工程的示范性阵地，肩负着在广泛开展中国党史教学与理论研讨、宣讲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培养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任务^[1]。而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重点。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市场经济也为大学生的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群体之间在收益分配上也存在着不平等，他们将由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化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2]。

“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倡，对于改善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学条件以及提升普通高等学校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来说，都起到了很大影响。各类课程教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育学生，对大学生来说更具有亲和力、感染性和渗透性。因此促进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能够在不引起学生反感的前提下实现全课程育人的目标，从而达到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3]。

(二) 利用各自的独特优势弥补教育

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不能够自觉地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必须通过学校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逐步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从而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开设相关课程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采用比较稳定系统和程序化的课堂教学方式给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教育方式直接，学生受益面大，教育成效显著，这是基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显性教育中的优势。但“思政课程”在教育领域的边界，需要“课程思政”有效补充。“课程思政”

主要是依托“四门主干课+形势政策课+公共选修课”，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的思想、情感、意志和价值观，属于一种系统化、概括性的价值引领，很难做到具体区分和满足各个学科、各个专业学生的现实需求，因此存在价值涵纳度较高、课程接受度偏低的困境。而“课程思政”可以帮助受教育者解决在国家建设发展和自我成长规划方面的困惑和疑虑，为“课程思政”所促进的价值引导和思想引导提供较为充足的知识和实践证明，使知识学习与道德提升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所以，“课程思政”在贴近学生专业领域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更适切的教育实践，并发挥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渗透性。

(三) 构建“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调教育，就需要建立思考政治理论课、专业课与综合素质选修课和谐发展的立体化教育模式，突出了显性教育隐性教育在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在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中注重价值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孤岛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两张皮”的问题，创造性地将人文与科技结合起来。牢牢把握了教学育人这一主渠道。首先，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基础。深刻贯穿并实施十九大精髓和全国高校思想理论教育会议精髓，认真学习习近平负责同志新时期的中国特色发展理念，坚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方向，聚焦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推进其从传统的教材制度到现代化的教学制度转变，丰富课程资源，加强对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培训和建设，增强课程亲和力，提升大学生的课程获得感。其次，以综合素养课为支撑^[4]。综合素质课是一门人文课程，超越了功利性和实用性，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我国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都可以涵盖进综合素养课的范畴之中。技术素质班的教学模式有助于融合现代学校不同的教学思想与方法，不仅反映了时代特征，而且保持了特色，把现代科技和我国的

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对提升育人质量有很大的帮助。最后，以专业课为辐射。相比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专业课教学中对知识传授更为偏重，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相对较弱。要想真正达到“课程思政”改革的总体教育效果，就必须全面发掘专业课的教育作用，深入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教育功能，突出在课程教育中的主流价值导向，进一步提升专业课中所蕴涵的教育基因、功能范式和道德元素^[5]。

二、“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现存问题

(一) “课程思政”协同思政课程的实施措施缺乏力度

目前，不少院校在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调教育的过程中，采取的相应举措不够努力，“课程思政”和思政教育中的协调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将学生培育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加班人，完成立德树人要求的重要任务^[6]。但是，许多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特别是实施和推进“课程思政”的工作中，存在着以会议贯彻会议精神、以文件贯彻文件精神的形式主义弊端。上海市是我国各省市高校“课程思政”的最先探索者之一，“课程思政”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和经验。但是，上海市在总结“课程思政”工作时，也明显地发现了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力的措施包括健全的制度体系、组织体系、评价体系等。有力的措施保障不仅仅在于推进“课程思政”的具体行动方案，还应有与之配套的相关激励、奖惩措施。作为近年来才受到关注的“课程思政”，在不少高校无论是管理层面，还是教师层面，大多处于认识了解阶段，如何推进“课程思政”，以形成与思政课协调育人的体系局面，措施的制定和出台还有许多空白^[7]。

(二) 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完善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二者的协同既需要有政策制度的保障，更需要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及激励机制来保证协同育人工作的顺利开

展。教学评价考核作为教学实践环节的重要一环，科学合理的考核与评价对检验教师教学成效、提升教师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8]。一方面，在高校的教育实践中，对不同教师主体都已建立了明确的评价机制，有着明确的评价标准，但是，对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成效的评价，当前高校还没能建立起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评价机制，受到协同育人成效抽象化特征的制约，在评价中存在着评价指标不明晰，评价方法单一等问题。另一方面，高校在对教师的激励机制建设方面也有待改善。在高校协同育人工作的驱使下，高校教师无疑要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固有的教育教学任务、科研任务及生活琐事的忙碌，教师势必会对协同育人工作热情不高，因此，对教师的协同育人工作给予适当的激励，会大大提高教师参与育人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协同育人的质量和成效。当前，为了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政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众多支持性政策，如对思政课教师及辅导员发放专项津贴补助，对辅导员设置专门的晋升通道等，众多的激励措施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质量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推动构建全员、全课程育人格局，要调动所有课程教师都参与到其中，将其纳入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但是，当前高校在协同育人的激励机制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如经费投入不足、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措施有待改进，再者，协同育人成效没有与教师职称评定及绩效奖励相挂钩，在激励机制上亟待完善^[9]。

（三）协同育人教师队伍建设不到位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发展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便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当前我国的发展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国民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依然存在，教师群体也是如此。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繁杂的工作任务使得部分教师在忙于处理工作、生活事务的同时很少有精力用于自我学习和提

升，使得教师自身素质无法得到较大的提升。再者，由于专业课教师和通识课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足，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思想、方法领悟和运用不到位，使得教师在思想政治素养提升中显得动力不足^[10]。

三、“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创新路径

（一）提高教师协同育人能力

提高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教师开展协同育人的基本要素。正所谓“师者德之范，行微以致远”。首先，教师应主动提升自我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政治思想学习领域，我们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掌握，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的政治时事动向，主动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拓展知识视野。思政课教师要深入研究相关的理论，以研促学、以研促教，在研究学习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专业课和通识课教师要利用好工作、生活以外的时间努力学习，提升理论素养，可以通过阅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及相关的理论书籍进行学习，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二）明确协同育人的评价机制

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协同育人的效果需要通过评价考核来体现，高校应以对协同育人成效的考核评价为重要抓手，找出存在问题，探寻发展方向。高校应确立多维度、系统完备的考核评价体系。一方面，教师要通过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体现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学校要通过多元评价教师激发创新活力。另外，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到评价的整体性和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应尽量涵盖教学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评价的方式方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三）注重育德和育才相结合

推动高校育人模式创新，一方面，对“思政课程”来讲，对“思政课程”来讲，提升其教学的实效性需要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籍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需要结合我们党已有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来鼓舞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借助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渴求，进而塑造其道德信仰，实现价值观的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的第一步是要具备良好品德，认识到将来要在家庭、社会中承担起责任，并积极思考自己在未来的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所扮演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 刘丹. 工科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22(3): 124-128.
- [2] 高学勇, 陆祖惠, 白雪, 马金娥, 张海南, 高珍妮. 高校专业思政、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2(2): 122-128.
- [3] 刘福英. “立德树人”视阈下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策略[J].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报, 2020(5): 59-62.
- [4] 李家波. 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协同

育人路径研究[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1): 55-57.

[5] 刘佳.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实践研究[D]. 西安科技大学, 2021.

[6] 杨秀萍.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前提、途径与机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39(12): 87-91.

[7] 陈晨. 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路径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1, 34(6): 75-76.

[8] 赵浚, 陈美琳.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检视[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1(1): 1-9.

[9] 初艺.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22(3): 139-142.

[10] 武亚珍. 高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难点与对策[J].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19(4): 3-9.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员。

新学期：行知合一 砥砺前行 乘风破浪 逐梦追光

——在重庆市育才中学校2022—2023年（上）开学第一课的讲话

文/张和松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秋来暑往，天高云阔，新学期如约而至。今天，我们乘着新学期的东风，怀着新学期的憧憬，隆重举行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今天，我们也迎来了初一和高一年级4000余名新同学以及44名新老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对新加入育才大家庭的老师们和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

在过去的一学年，育才人师生团结一心，以行践知，砥砺前行；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凭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优异成绩，荣获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学里唯一一所办学质量评价特等奖。

中考、高考捷报频传，目前高2023届高考已经有10位同学收到了北大清华的录取，10份港大录取，4份新加坡国立大学录取，4份南洋理工大学录取。在北大清华和世界名校的录取人数上，取得了近年来的重大突破。国际部AP班，斩获1份英国牛津大学无条件录取，1份哥伦比亚大学、2份帝国理工、2份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今年我们的学生共收到了72份QS世界大学排名前30位大学的录取Offer。我校中考在全体初三老师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上700的特高分和本校直升的比率也都取得了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党委书记张和松讲话

重大的突破。

学科竞赛佳绩连连，初中国际信息学竞赛，获2枚金牌。在高中五大学科竞赛中，共收获3金5银1铜，47人次获省级一等奖。其中，高2023届周熙正、谢祉锐、霍忻琦三位同学，均因竞赛获金、银牌，破格入围强基计划，并通过强基计划考入清华北大。高2024届吴戈同学，获信息学决赛金牌，进入国家集训队，提前保送清华大学。高2024届刘佳仪获化学银牌，黄彦涛、钟骏宇获信息学银牌，这三位同学破格入围清北强基计划。也让我们一起期待，9月份进行的数学、物理决赛中，育才学子能够再创佳绩。

艺体成绩硕果累累，学校艺术团获全国艺术展演银奖1次、市级一等奖17项、个人艺术单项比赛获国家级一等奖9人次、市级一等奖29人次、近10名艺术特长生考入清华大学等知名学府。学校运动队团体项目获全国第一名1次、第三名1次、

第四名1次、重庆市冠军3次。特别是学校男排，在时隔3年之后，捧回第五座全国冠军奖杯。个人项目获全国冠军8人次、亚军6人次、季军6人次。今年，排球队和田径队有两位队员考入清华大学。

科技创新成绩斐然，学校荣获“全国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称号，是重庆市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学校。2023年学生参加科技类竞赛荣获全国一等奖4项、全国二等奖8项、重庆市一等奖21项。

这正是育才人坚持“行知育才，教育为公”的办学理念，深耕高质量发展，落实因材施教，在这个金秋的丰厚收获。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学校，向过去一年精诚团结、勤勤恳恳、积极进取、努力拼搏的全体育才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师们、同学们，育才过去一年的成绩足够令人振奋，我们也相信育才人定会心怀梦想，铆足干劲，实干笃行，再开新局。

育才一直是一所所有梦、筑梦、逐梦的学校。近代中国危机多难，1939年陶行知老校长怀揣着教育救国之梦，为拯救中国命运，寻求中华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他创办育才中学，用大爱、求真、创造、奉献的精神，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培养出一大批祖国栋梁。而今的我们传承行知精

神，向着把育才打造成为一所国内知名、国际一流的创造型学校的梦想而奋斗！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对学生群体的殷切期盼，论志向、谈梦想、讲奉献，鼓励学生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同学们，中国梦，育才梦，我的梦，相与为一。作为青年的你们，人生的黄金期贯穿了“两个一百年”的国家战略目标，是担任民族复兴重任的“强国一代”，这既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也意味着必然要肩负责任和担当。情怀如梦，家国在心，来到育才，希望你们能够怀揣梦想，把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牢记陶老先生：“我是一名中国人，当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谆谆教诲；牢记“求真、乐群、行知、创造”的育才校训；牢记“大爱、奉献、求真、创造”的行知精神，肩负使命，锤炼本领，为育才增光，为祖国献力。

育见梦想，才会发光，乘风破浪，砥砺前行。同学们，让我们怀揣梦想上路，不负韶华流年，以洪荒之力，凭着到中流激水，浪遏飞舟的豪情，在育才这块沃土上奠定人生最坚实的基础！

最后，愿全体老师家庭温馨、工作顺心、事事如心；愿全体学子快乐学习、不断进步、幸福成长！

开学第一课 | 追光逐梦有你我，行知路上展青春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2023-2024学年上期《开学第一课》

“追光逐梦有你我，行知路上展青春”。2023年9月1日，备受瞩目的育才中学《开学第一课》以全新面貌登陆校园。

本学年的《开学第一课》分为“育见梦想·才能追光”“行知少年·敢梦敢闯”“育才青年·有你有我”三个篇章，从邂逅到成长再到回望，通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发展阶段的育才学子自述与视频再现相结合，为在场观众勾勒出鲜活的育才青年成长画像，开启育才新生代的未来展望！

育见梦想 才能追光

夏日将毕，秋风正起。新的学期、新的征程，育才中学这个大家庭又迎来了一批新的“追光者”！就在昨天，初一、高一的小陶子们伴着晨曦，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踏入了菁菁校园。

曾俊达（初2026届8班新生）：

盼望着，盼望着，我终于成为了育才小陶子中的一员。

记得5年前的一天，我们开车路过鹅公岩大桥，妈妈突然指着前方一栋高楼开心地对我说：“儿子，妈妈以后就要到这里来工作啦”！我抬头一看——育才中学。我随意地回了一个字——“哦”！

很快，我觉得去了育才的妈妈变得更忙碌了。她要准备公开课、要外出学习、要出题、要改卷、要赛课，要接听好多家长和学生的电话……唉，妈妈都没时间陪我和弟弟了！

有一个周末，妈妈和组内的老师们要审题，把我也带了过去。我心想，周末还得加班，真惨啊。可当我看见妈妈和同事们，认认真真审查底稿，仔仔细细推敲选项，为了一个答案的最终确定快乐争辩时，我觉得，妈妈和她的同事们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美。原来，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加班，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还有一次，期末考试后，正好妈妈还没放假，我就去妈妈学校玩。当我无意间拉开妈妈办公室的抽屉，我惊呆了！里面放满了纸条和卡片，那是学生们写给妈妈的。“吕老师，谢谢你……”“吕老师，节日快乐……”这些温暖而真挚的文字里面充满了对妈妈的喜欢和感激。下课时，我看到好多学生围着妈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走在路上，不断地有同学开心地向妈妈问好。我感受到了妈妈的幸福，我想，这或许就是

妈妈平时忙碌的意义吧！

这几年，在妈妈的引领下，我理解了努力的意义，懂得了付出的价值，也越来越向往育才中学。今天，我如愿成为一名小陶子，内心充满喜悦和自豪，更充满向往和斗志。妈妈用自己的努力，捧回了一张张奖状，也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未来，我也会不懈努力，遇见梦想，勇敢追光！



故事分享《我的育才故事》
(从左至右：曾俊达、周子彦老师、徐文茜)

徐文茜（高2026届30班新生）：

看着曾俊达学弟，便想起了三年前的我。

和他一样，刚到育才的我，也是这般喜悦激动，青涩懵懂，无限憧憬。

从小热爱语言的我，喜欢朗诵，喜欢聚光灯打在身上。于是，来到育才，我加入了育才语言队，成为了一名播音主持艺术特长生。

很快，迎来了我在育才的第一次主持。初一我被安排和一个高一的大姐姐一起主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紧张感涌上心头，在后台，不停吞咽口水，来来回回踱步。侧头看向大姐姐，她淡定又从容，我问道：“姐姐，你不紧张吗？”她说：“不紧张呀，主持得多了，自然就不紧张了。”这云淡风轻的一句话震住了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自己可以像她那般，站上舞台，谈吐大方，光芒闪耀。

可现实往往比想象的残酷太多。播音主持这条路上优秀的人儿太多，激烈的角逐随时展开，让你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初二，我陷入迷茫，“专业”与“文化”，我难以平衡，不知所措。我在想“我真的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吗？”“为什么文化课如此繁重的情况下我还要去排练？”直到我的班主任对我说了这个词“如虎添翼”。是的，我可以让我专业为我锦上添花，而且我热爱播音主持，我不再纠结能否把专业做得足够好，而更注重过程的享受！

时间很快，转眼到了初三。誓师大会上，我迈着坚定的步伐，站在舞台中央，褪去了胆怯与纠结，带领全体小陶子一起喊出了铿锵誓言。那誓言，是对我的初三说的，也是对我的专业说的，坚定选择，坚持热爱，坚持梦想。今天，当我以高一新生的身份站在这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是育才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我历练与实践，成长与坚定。

逐梦之旅，奋斗不止，追逐不停。

周子彦（高2026届教师）：

正式成为育才大家庭的一员，是在去年，但是我和育才的缘分，和他们一样，始于几年前。

2019年，我在北师大图书馆里偶然查阅到一本名为《陶行知文集》的教育学著作。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陶先生的教育理念，让一直梦想成为教师的我获益匪浅，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陶先生的一句教育格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我也所修读的化学学科也正是一门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科。对“求真”的共同追求，成为了我与育才中学不解之缘的开端，成为了我践行教师梦想的开端。

2022年，我鼓起勇气自荐，经过努力我荣幸地加入了育才中学。

随后，我担任高2025届化学竞赛班教学工作，初任教师，面对怀揣梦想、求知若渴的学生们，我深怀着紧张和忐忑。然而，当我与这些学生们一起怀揣对“真知”的梦想和渴望，我逐渐将这些紧张和不安转化成了朝着教育梦想迈进的不竭动力。其中也有许多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一次，我们组织化学竞赛联考，考题难度极大，大多数同学无从下笔。在考试过程中，一位平时乖巧认真的女同学突然情绪失控，冲出了考场。这突发状况让我束手无策，我只得追出去，

就在我试图安慰她时，这位女生一边抹泪一边坚定地說道：“哪怕竞赛学习再苦再难，我也绝不放弃！”接着她讲述了她参加竞赛学习以来的经历，有过困难，流过眼泪，但梦想未曾动摇。我默默听着，决心帮助她追逐梦想。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帮助她夯实基础，拓展难题，建构思维。看着她在题目中重拾自信，在成长中接近梦想，我倍感欣慰。

在育才的这些时光，是做“真”教育的时光，也是寻求“真”梦想的时光！

从葱郁美丽的行知广场到我们夜以奋战的教学楼是一坡难爬的阶梯，阶梯上闪烁着八个大字：育见梦想，才能追光！陶老校长给我种下了求真的教育梦想，我也愿意在这上升的阶梯上照亮自己和同学们的梦想，一起遇见梦想，闪闪发光！

行知少年 敢梦敢闯

陶行知老校长曾给教育下过这样一个简短的定义：教育就是教人做人。而他又反复强调，道德才是做人的根本。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此，陶老校长基于教育的实践，提出了“育才十二要”，即育才学子们的行为规范。

如今，基于对“育才十二要”的“守正创新”，学校结合学生德育常规评价标准及当下社会的时代需求，设立“育才十二星”奖项。

“育才十二要”的内容涉及到习惯的养成、人格的塑造，也涉及到社会的责任和行事的要求，既是每位育才人的行动纲领，也是每位育才



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颖解读“育才十二要”

人的人生目标。

从“育才十二要”到“育才十二星”，这既是育才人血脉里流淌的精神传承，更是继往开来的行知少年们修身立德，敢梦敢闯的精神底色！

行知少年们，让我们一起向着新时代吹响的奋斗号角，破浪前行，勇敢追梦吧！

育才青年 有你有我

不论是获得“育才十二星”荣誉称号的他们，还是平日里为了梦想挥洒汗水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育才青年”，而其中的闪光者便是育才团委学生会的广大成员。

团委学生会一共有10个部门，分别是：组织部、秘书处、纪检部、宣传部、学习部、生活部、文体部、广播电视台、社团联合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他们在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希望之后有更多的新同学加入到团委学生会这个大家庭当中。

未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将“育才青年”这个名片传递，用奋斗书写最美的年华，因为：育才青年，有你有我！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校长郭华为“育才十二星”颁奖

李鸿艳（高2025届14班）：

“选一根柳条，切成两寸半长的节，剥去柳条的外皮，放进圆铁罐里，灌入一些沙子，放进炉子里烧制，一罐好用的木炭条就做好了。”这是著名木刻版画家伍必端回忆自己和师友40年代在育才学校自制炭笔的经过，细致入微。抗战时期，物资匮乏。陶老校长说：“没有工具，可以自己做嘛！”当时，学生不光是自己画、自己刻，连木板也是自己锯、自己刨、自己整理平整，老师从不过分改稿，每一件作品都源于学生

本真的创作。

1942年10月16日，学校音乐组举办音乐夜会。人人都有机会上台演奏，机会均等：杜鸣心、黄晓庄等人演绎别具一格的“弦乐四重奏”；陈复君深情歌唱，致敬革命先烈；少年陈贻鑫激情高歌“恢复旧山河”……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夜晚，少年的想象力前所未有地释放；那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夜晚，无数从育才走出去的艺术家，曾在那时初露锋芒，熠熠闪光！那更是一个属于育才青年流光溢彩的艺术盛会！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抗战时期，育才青年自强自立，以实践搭建通往梦想彼岸的桥梁，在陶老校长的指导下，以“艺术为人民”的理念讴歌普罗大众，携着眼中的不灭希望，奔赴星辰大海。八十余年后，育才校园里的青年依旧鲜衣怒马、意气风发，诠释着新时代的“育才青年”。



故事分享《我们的名字叫“育才青年”》
(从左至右：李鸿艳、许立扬、汪禹辰、赵宣懿)

许立扬（高2025届19班）：

不久前，第40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成都七中成功举办，重庆仅两人获得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其中一位便是我们育才的青年——高2024届20班吴戈。

初一，他凭着对编程的满腔热爱进入校训练队，但未来的路却并不那么清晰。初三，正式转入竞赛班，这时才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联赛的一次失误，差点让他错失未来进入国家集训的机会，后来在教练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C组训练。跌过跟头，更知道机会多么难能可贵。之后的两年，面对疫情，他独自一人训练竞赛；大年初一，独自在家学竞赛课；寒暑假，一个人在机

房打代码；深夜，默默流泪然后，迷迷糊糊地入睡……他总是全力以赴，却每每得不到想要的成绩，曾无数次怀疑自己，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竞赛，但他都一次次挺了过来。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今年的国赛上拿下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为竞赛生涯画上了满意的句号。赛后，吴戈学长在日记中写到“竞赛的日子不想记得，可就是忘不掉，我只想哭，也只会哭。”

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打击，做得到坚持，拼得了全部，这就是吴戈！

如今，已被保送清北的吴戈学长也在指导信息学竞赛的学弟学妹们，为育才贡献自己的学术力量。

求知求智，真理无穷趣不舍；明人明理，赋到沧桑句便工。无数像吴戈学长一样的育才青年，他们追寻理想，满怀热忱，在学术殿堂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行。埋头赶路，不问西东，这便是育才“学术青年”的模样。

汪禹辰（高2025届14班）：

2022年夏天，重庆巴南发生山火，情况危急。消防、应急等各部门及时响应，社会各力量被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救火行动中。我校学子吕游、周峻豪闻讯后，也果断加入到灭火志愿者队伍。

山上火情越发严峻，急需年轻力壮的志愿者到一线增援。两位同学没有丝毫犹豫，主动请求奔赴前线。上山的路崎岖坎坷，挡在前方的一座座火山，烈焰冲天，将黑夜和天空烧得通红。他第一次感受到：火是威严的，也是狰狞、恐怖的。

建立隔离带；提着水桶往明火处赶；往前方运送头灯；保障后勤供应……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们勇敢无畏，迎难而上，满面尘灰却目光如炬，誓与火神一战到底！经过三天两夜的全力扑救，明火已被扑灭。稍作休整后，他们又参加了两天两夜的巡山、消灭余火的行动。

火灾后的大山格外安静，植物被烧毁，土地被烧焦，大片大片的山林裸露，动物也早已不知

去向。放眼望去，满目苍凉，惨不忍睹。

今年312植树节，高2024届7班全体同学在班主任杨雷老师的带领下迎着初春的料峭，踏过坎坷的残迹，登上被山火吞噬的缙云山，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种下一棵棵树苗，种下新生的希望。栽种结束后同学们在树枝上系上卡片，并写到：“让我们在来年的春光再次相会，用歌声咏赞生命的顽强！”

这些也让我想到，洪水过境后投身清淤行动的同学、利用寒暑假去市图书馆做义工的同学、在陶行知纪念馆担任讲解员的同学，他们都是育才的青年，是育才“公益青年”的模样，心怀大爱，知行合一。

赵宣懿（高2025届27班）：

2023年5月6日晚，第19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高中男子组在山东潍坊落下帷幕，育才男排从名校云集的参赛球队中脱颖而出，以3：0的绝对优势战胜东道主潍坊中学队，勇摘桂冠，捧回第五个全国赛事冠军！宣懿教练在赛后接受采访时感慨道：“想不到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们颇有大将风范，临场能力超乎预期，临危不惧，不骄不躁，总能够在比分落后时扳回比分。”而关于冠军成功的秘诀，队长沈九熹则毫不犹豫地说到：“这一切都得益于队伍的凝聚力。”临危不惧、不骄不躁、团结拼搏，是这个冠军队伍的标签，也是育才体育的精神内核。

在激情迸发、熠熠生辉的体育之外，还有捷报频传、沁润人心的艺术成就。仅在2023年，我校学生艺术团就在各类艺术展演中斩获1个国家级银奖，6个国家级单项奖，22个市级一等奖，和60项区级一等奖；艺术团的同学说：“因为热爱让我们聚到一起，因为追求让我们勇往直前。”“我们在学校的托举下斩获荣誉，也将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唱响育才的旋律。”

育才艺术是人民的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培

养出的是与时代、与生活、与大众紧密相连的育才人，他们鉴赏美，创造美，传播美，践行着育才美育的新理念。体育和艺术，就如育才星空中璀璨的两颗明珠，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展示，以及美的享受。育才人用热烈加持人生，以热血拼搏当下，以热爱成就梦想。这就是育才“体艺青年”的模样！

“我们的名字叫育才青年”，这是多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宣誓！生长在新时代，育才青年必将把梦想书写成现实，跨越一个又一个艰难挑战，成长为建设国家的中流砥柱。

从我们的育才校园也走出了这样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育才青年，值此开学之际，他们也为学弟学妹们送来了真挚的祝福，让我们一起走进“致我们的育才时光”！

出发向未来

从春雨的满怀期待，到冬日里白雪皑皑，屹立不倒的是华夏儿女亘古不变的精神，勇往直前的是时代前行不可磨灭的足迹。

将一切梦想化作热爱，献给家国和时代。这是新时代的青年为理想献出的庄严誓词，更是中华民族千年血脉的生生不息。

新时代，新征程，育才青年郑重宣誓：功勋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未来充满希望，未来有无数梦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让我们乘风破浪，一起出发向未来！



歌舞《出发向未来》

贺中秋，迎国庆 | 最美的相“育”，“才”是最好的开始

文/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尊敬的家长、亲爱的小陶子：

展信舒颜！

中秋月明，万里同辉。祖国华诞，举国共庆。

中秋佳节与祖国七十四华诞喜相逢，红旗飘飘庆盛世，笑语盈盈话团圆。中秋明月与国庆红旗相拥，是家与国的融合；月亮白与中国红相映，是最美的风景。

在此，育才人为你们送上一封家书，捎带两份祝福，搭建三方育人桥梁，共赴百年育才征程。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当中秋遇上国庆，凝结于心的是家国一体、荣辱与共的家国情怀。

西子湖畔秋意浓，国风雅韵庆华诞。9月23日，第19届亚运会在杭州拉开帷幕。一处处现代场馆、一个个首创理念、一次次科技赋能、一场场全民健身热潮……杭州亚运会以“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理念照耀未来，辉映金秋明月，拂过万里江山。时代的新意在西子湖畔淋漓展现，世界将见证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亚运盛会。这次体育盛会，也将在亚洲和世界体育史上，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伟大征程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国庆节，值得我们举国同欢庆，共享繁华。秀美的山，灵动的水，长街锣鼓不减，人潮往返，是山河远阔，更是烟火人间。欣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



这个中秋节，值得我们千里赴团圆，共话家常。一壶茶，一张桌，一片月，一家人，唠不完的家常，道不尽的牵挂，家家其乐融融。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殷殷之情俱系华夏，寸寸丹心皆为家国。月圆共此时，便是最美的相遇。

亲爱的家长们，当你带着孩子跋涉山水间，请告诉他——我们与自然休戚与共；当你带着孩子流连博物馆，请告诉他——历史指引我们走向未来；当你带着孩子与乡土中国相拥；请告诉他——乡土是我们精神的原乡；当你带着孩子与祖辈团聚，请告诉他——祖辈是我们的来处。

当育才遇上你们，坚守于心的是生活教育、爱满天下的行知文化。

金秋十月，微风徐徐，小陶子们与育才如期而遇，这是最美的相“育”，也是浪漫的开始。

集巴渝山川之灵气，承行知先生之风骨。我校以深厚历史底蕴，牢记“行知育才，教育为公”的初心使命，以“生活教育”为原动力，以“大爱、奉献、求真、创造”的精神描摹教育蓝图：学校、学科、校园、家庭组成的“四大课堂”，延展生活教育的生长空间；“行知少年·敢梦敢闯”“育才青年·有你有我”两大学生活动品牌，构建学生学习探索、自我展示的平台，提供可持续的成长路径；学科竞赛、科技创新、

社团选修、生活教育课程——多元课程体系，搭建多路径发展平台……我校秉承陶行知先生的行知精神，以爱满天下的情怀，践行生活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育才青年！

育才人初心如磐，始终躬耕不辍，四季辛勤。在三尺讲台，为小陶子传道授业；在实验室，带小陶子探究科学；在育才大道，与小陶子共话未来；在行知园里，与小陶子共享阅读；在操场上，与小陶子强健体魄……育才人永葆“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共筑基础教育的教育理想国。

国安，所以家圆。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富强！亲爱的家长，当你的孩子来到育才，我们便有了亲密的联结，也有了共同的责任——将小陶子培养成优秀的人。愿小陶子们在行知园里扎根，满怀希冀，肆意生长，如愿成为勇挑重担、堪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育才陶子，生逢盛世——最美的相“育”，“才”是最好的开始……

顺颂
秋绥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2023年9月28日